THE OBSERVER

觀察

·每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每份售三千元·

第二卷　第二十期

專論

從印度分治說到中國前途　何永佶

教育莫忘讀書！讀書莫忘救國！　樊弘

為本屆大學畢業生進一言　任鴻雋

討論

評方顯廷先生的經濟觀點　笪移今

生活與文化

蠻一點，孩子！　費孝通

觀察通信

從四平之戰看東北前途（瀋陽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學潮」平息了麼？（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週末閒欄

論風度　張嘯虎

文藝

論悲劇人生觀　陳瘦竹

讀者投書

香港報界對於孫科談話的反應
戒嚴令不可隨意使用
中國軍人本來前進
紐約來鴻
怎樣實現「草根民主」？
恢復人性‧重視人權

觀察文摘

為中國問題忠告美國　張東蓀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葆　戴鑄齡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穆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韋斬以　馮友蘭　曾昭掄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嚴世光　蕭乾　顧翊羣

讀者投書

香港報界對于孫科談話的反應

編輯先生：近日孫科副主席接連發表了幾次指摘蘇聯，主張討伐中共的談話，其內容雖然有點驚人，可是結果不但得不到各方的響應，甚且還遭受到紐約先鋒論壇報的反擊。這情形在香港也是一樣。本港幾家老牌民營報紙均不同意孫氏的主張。各報均認為停戰和平才是國家唯一的生路。華僑日報更坦白指出將國內糾紛轉為國際糾紛實為不智，且依賴他人更屬要不得，結果難免被人操縱，不由自主，十足成了可憐的「過河卒」，國運就不堪聞問了！同時平日反共色彩頗厚的星島日報也認為目前應「爭取」中共而不該抱「打垮」念頭。本港的民營報都是親政府的，現在論調竟是如此，是則人心趨向如何，於此可見矣！

梁子奇　六月廿六日　香港

戒嚴令不可隨意使用

編者先生：戒嚴令在今天成了一塊萬能擋箭牌，這裏實施，那裏實施，你也發佈，我也發佈，甚至連縣長駐軍，也在擅自頒佈。輕率隨便，一至于此。六月二十日重慶大公報載：「內江自六一午後發生搶米事件，當晚七時許，縣府會同駐軍一九四旅宣佈戒嚴。」六月廿一日同報載：「瀘縣於十五日晨發生搶米事件……當局宣佈臨時戒嚴。」可見戒嚴令發佈之濫。戒嚴法規定戒嚴令的發佈，有下面三條：

第一條　遇有戰事，對於全國或某一地域應施行戒嚴外，國民政府經立法院之議決，得依本法宣告戒嚴。

第三條　戰爭之際，要塞、海軍港、海軍造船所、或某一地域猝受敵人之包圍或攻擊，或應付非常事變時，該地最高司令官得宣告戒嚴。

第十四條　國內遇有非常事變，對於某地域應施行戒嚴時，國民政府得不經立法院之議決宣告戒嚴……。

施行戒嚴不經立法院之議決，單由國民政府發佈命令，已是不得已了。至於最高司令官的宣告戒嚴，第一，必須在戰爭之際，第二，必須在與軍事有關地域，第三，必須在事變發生而需要「應付」之時。政府的法令上規定得明明白白，當局在發佈命令時，該是很清楚的。這次全國各地先後戒嚴，都是該地最高司令官宣佈的，董顯光答記者問云：「根據戒嚴法第三條之規定，接近戰區之城市或地區，當公共治安遭受威脅之際，當地最高軍事司令官得隨時宣佈戒嚴。如最近北平、天津宣佈戒嚴，即其一例。」北平、天津姑且承認其適用，那麼，對於廣州、福州、重慶、成都、內江、瀘縣又怎樣能根據第三條呢？戒嚴法第十五條云：「戒嚴之情況終止時應即宣告解嚴」。但是，「上海自三十四年十一月經國府宣告戒嚴後尚未宣告解嚴」就不免不近情理了。至於重慶這次的戒嚴，理由既是防止暴動，現在暴動已由事實證明是當局的敏感，但二十多天了，也還沒有宣告解嚴。此外，戒嚴令也不是天羅地網，包容萬象，宣告之後，便可以一切例外，隨意處理的。關於戒嚴時期的政府職權，審詢限制，戒嚴法都有明確規定。但是事實上，戒嚴時期最深刻擾民的是侵入住宅，逮捕人民。關於這項，只有在第十二條第六項裏有根據，作如此寫：「接戰地域內對於建築物船舶及認為情形可疑之住宅得施行檢查但不得故意損害」。那麼，武漢、重慶、成都既非接戰地域，為什麼政府竟能包圍學校，射殺學生，逮捕大批教授、學生、記者及平民呢？再說，即令逮捕是合法，對於受逮捕者也不能不照法處理。一般人有個誤解，認軍法高於一切，所以平民也該受軍法審詢。其實軍法與民法是並行而不應互犯的。陸海空軍刑法對於軍法可以審詢平民有詳細的規定，這裏不詳。戒嚴法第九條云：「接戰地域內關於刑法上左列各罪，軍事機關得自行審判或交法院審判之：一內亂罪，二外患罪……」（按：此次重慶戒嚴，當局曾摘抄上面這條，以示於法有據，但却巧妙地省去重要的「接戰地域內」五個大字，見六月二日大公報）除掉平津等城市外，長江流域以南各城市無論如何不能列入「接戰地域內」。但被捕者都是完全軍法審詢，不能不說是有違戒嚴法。何況第十四條明白說明：「戒嚴地域內不得侵害地方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之職權，關於刑事案件如認為與軍事有關而施行偵查者，該地軍事機關得會同司法機關辦理之，偵查後仍交由司法機關依法辦理。」

報載廣州學生曾發動「焚毀六法全書」運動，悲憤之情可以想見。我也懷着近似的心情來寫此信，希望當局慎加考慮，對於自己訂出的法一定要遵守，對於國家社會的安定不能靠根據不足的戒嚴令來維持。

冰　波　六月廿五日　重慶

中國軍人本來前進

編者先生：我是個由「客觀」而「觀察」的兩代讀者，對于目下各種刊物中，最愛好的祇有「觀察」。二卷十八期貴刊讀者投書中有「中國軍人在前進中」一文，覺得有一點意見。我是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時入黨，十四年激于「五卅慘案」，投到黃浦陸軍軍官學校，十五年參加北伐過來的一位不折不扣的黨軍前輩（有保定派在，不敢稱老前輩）。我體察中國軍人，大都是前進的，除領「特支費」的部隊機關首長外，誰都不滿現狀，誰都是愛國愛民的。其所以有「行為乖張」者，那全是政府和領導者所逼成的；其所以「噤若寒蟬」者，也全為怕特務檢舉，不但危及自身，抑且有使家破人亡的可能的關係。那末他們為甚麼不像學生那樣用行動來表示他們內心的苦悶呢？這也因為他們有「軍法」「軍紀」牢牢地桎梏住他們的四肢與身體。不過我終相信會有這麼一天，像「巴黎公社」一樣，像「十月革命」一樣，像「辛亥革命」一樣，這般外表是服從，（下接十八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冊三千元。
訂閱：平寄先付四萬元
掛號航空先付五萬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二十期
三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本期作者

何永佶：
樊弘：北京大學教授
任鴻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總幹事
宣移今：上海銀行專員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張曉虎：復旦大學學生
陳瘦竹：國立戲劇學校教授

從印度分治說到中國前途

何永佶

在一篇討論斐列濱政黨的書評裏（世紀評論一卷二十期五月十七日），以下的一段話，可以作為印度分治的序言：——

「但一獨立後，殖民地的各階層便分化起來，那時便有左右翼之爭，爭而不已甚至動武，所以這次斐列濱得到獨立後即發生內戰。這時候中央極端集權之國家勢必弄到內戰一發不可收拾。蓋殖民國一退出後而曏昔鼓吹獨立之黨一舉而握住中央之政權，如果這政權為極端集中者，則異黨雖與這黨在鼓吹獨立一點上意見一致而在其他政治措施上不能一致之政黨，必覺得無地容身，勢必鬥爭到底而內戰延長。所以美國這殖民地在驅逐了殖民國英國之後，幸而有十三州之分治，所以未發生內戰，然加拿大則在英國主權逐漸減跡幾至退出時則發生內亂，後卒因 Lord Durham 明白此「竅」，建立了一個聯邦分治的局面，而加拿大得到和平統一。印度現快要脫離英國這殖民國的統治，明年六月一日後，印度會不會發生內戰，全在印度執政者能否給印度的少數民族高度自治。」

那知道沒等到明年六月一日後，印度已提前一年實行分治了。六月三日，英國所提出而為印度各政治領袖接受的印度分治方案，一言以蔽之，為使印度劃分成一個印度教徒自治的政權（名叫印度士坦 Hindustan）及一個回教教徒自治的政權（名叫巴基士坦 Pakistan），兩個都任其自願地留在英國帝國內為自治領。根據西敏士特大法（Statute of Westminster），英帝國內之自治領實際上是獨立國家，且有權隨時退出帝國圈子之外。這個方案實行之後，印度將不是一個印度，而是兩個，甚至多個，因為直接隸屬於英國主權下之印度蕃邦（Indian States）亦可以宣佈獨立不隸屬於印度任何之一半。

這個把印度斬成為最少兩半的方案，一生致力於謀印度完全獨立之甘地，自然是不贊成的。他是要一整個印度，而不是要兩枚半個。但甘地的股肱如尼赫魯白托爾之輩，均已接受此分治計畫。尼赫魯稱：「我們已決定接受英國之建議。……我們所要的統一不是出於強迫，而是由人民自由團結。這種方法也許能使印度更強大，更安全。讓我們不追究過去，忘了仇恨。罪惡性的變亂必須終止，我們決定要終止牠。」

尼赫魯要終止「罪惡性的變亂」之辦法，不是根據「政令統一」的「壽夾闆」，而以武力來敉平回亂。正相反，他讓他們走開，不強拉。回教聯盟得到牠們一向鬥爭的對象——巴基士坦——心滿意足，遂由其黨魁真納命令其黨徒停止其暴動及不服從運動了。不經過暴動及不服從運動，不破幾個頭死幾個人，尼赫魯等人不知道分治計劃之應時。大概說，這為各方所接受的計畫，是這年來印度局勢演變中所迫出來的。

但我們中國二年來局勢的演變，已經破了不止幾個頭，死的不止幾個人而已了。迫出來一條辦法沒有呢？很不

幸，我們偌大中國中竟無一人有尼赫魯那樣人的智慧，當政的人仍脫不了中古時代「捉巫婆」（Witch-hunting）的作風，無論出甚麼岔子，台灣暴動也好，工廠罷工也好，學潮澎湃也好，總是「共產黨人」幹的，在我們這些不識不知的老百姓面前，把共產黨的神通渲染到通紅通熱，其不令人油然景往於共產黨的佛法無邊者幾希！（前幾天即有上海一羣小學生要往共區，因爲他們聽說共區裏的小學生都可以佩帶手槍。）幾曾聽說有過人想到現在中央之拉攏地方的法子不對而思有以改弦更張的呢？

在中國傳統中央拉攏地方的辦法，爲由中央委派大吏去到地方爲民之宰，所派去的人又都不是那地方的土著而是由別處來的官爺。中國用了這個辦法來維持統一垂千餘年，似乎這個是道地靈方，沒有甚麼問題的了，所以到了今天仍照行勿替，且有變本加厲的趨向。近來的幾個大城市紛紛改爲直轄特別市，可見中央極端集權的趨勢，有增無減，然其結果則變亂頻仍。爲甚麼從前用的那一劑藥現在用而不靈呢？

因爲現在所泡製的藥，少了兩味甘草：——

（一）中央政府的「無爲」

（二）官吏通由科舉出身。

從前中國中央政府，比起近代的政府來，是個極端「無爲」的政府，「無爲」者，做事很少很少之謂也。從前中央政府一大部份的時間與金錢花在「祭祀」上，「郊祀」、「廟祭」、「祭天」、「祭孔」、「祭社稷」等等，不一而足，皇帝的一個主要作用有點像原始時代的「巫師」，他經常要辦的事是祭。他不經常要辦的是「大元帥」的事，是動兵平內亂。這兩件大事，一件經常，一件例外，構成「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的一句話。除了多時不一見的「戎」外，只以「祀」爲大事的政府，其「無爲」程度可想而知了。這樣少做事的政府，其在地方的代表官吏也無須乎多做事。從前由中央委派至地方的大官只有三個：一個叫「巡撫」（俗稱「撫台」）管兵馬軍隊，維持治安；一個叫「布政司」（俗稱「藩台」）管錢糧民政，統率也是由中央派去的縣知事。又一個叫「按察司」（俗稱「臬台」）管人民訴訟，申民冤屈，然他不能亂殺人，而「秋決」囚犯時，還須皇帝裁可。因爲政府在地方所辦的事也只這兩樣，所以從前縣知事的「師爺」也只兩個，一叫「錢穀師爺」，他辦的是給「藩台」大人看的公文，另一個叫「刑名師爺」，其所辦的公事是給「臬台」大人看的。政府在地方所做的事，只此二者，一是替皇帝掏一下老百姓的腰包，一是替皇帝打老百姓幾板屁股。屁股容打得頗重，然腰包則掏得極輕，不過老百姓地用收入之十分一甚至二十分一，過此則大亂作矣。此外的男婚女嫁（及連帶的人口登記）修橋築路（交通）子女讀書（教育）買賣往來（貿易）等等事宜，皆由地方老百姓自行去辦，而政府無與也。這樣的「無爲政府」才能抽稅少，抽稅少才能擾民少，擾民少然後皇位始坐得穩。

替皇帝辦這樣少事的地方官，皆由中央派去，與今日相同。但與今日不同的，是這些地方官均須由科舉出身，即是熟讀過四書五經仁民愛物之學說的人。他們須「十年寒窗」且經過幾番嚴格的考試，不是純由裙帶及其他關係互相牽引而來的。

中央委派地方官吏的辦法，在從前之所以行得通，是因配合着這兩大制度：配合着科舉考試制度，然後地方官吏才不成爲一你牽我引，夤緣得位以魚肉地方的蝗蟲；配合着「無爲」政治，然後雖欲魚肉地方亦難魚肉很多。明乎此，則可知中央委派的辦法，在今日之所以行不通之故矣。現在中央政府所要辦的事，遠多過從前中央所要辦的事，而所要辦的事，件件要錢，這錢無論如何轉濟，總出在老百姓身上。中央愈有爲則做中央的官之地方官吏愈須向地方老百姓身上大抽特抽，而這些官吏又皆由主觀地挑選牽引而來，未曾經過「仁民愛物」之訓練，復未曾經過客觀的考試，而其後面又常有中央因需錢用要他們專當這個收賬那個等等之命令，其擾民招怨，激起變亂，豈足異耶？豈足異耶？

台灣發生暴動的時候，有人問我：「東北爲甚麼沒有暴動呢？」我說，「在東北，要暴動的人都跑到共產黨那裏去了！」蓋東北爲現在中央拉攏地方的辦法行不通之一好例子。東北一向是特殊區域，其中之風土人情與江南者扞格不相入，然東北的大吏，沒有一個不是由江南派去。他們帶去那裏的官員，多不是本地人，所謂往去「接收主權」的十幾個軍，除了一個後來很晚才派去的五十四軍（軍長是東北人）外，又無一個軍是東北的土著。「大兵所至荊棘生焉」，軍隊所到過的地方，沒有好東西剩給你。這些軍隊如係本地人，則一則因他們有鄉梓之情不會爲已甚，二則雖有甚麼，本地人亦可以爲「楚弓楚得」，也不至於那麼生氣。今由外面來幾

十萬的外省軍隊，所向抽括，這從地方看來，又是一次被征服而已，與淪陷時何異？怨望的東北人則往共產黨那裏跑，這便是爲甚麼在日本統治時東北沒有一個共產黨，而日本投降後未到兩年東北的共產軍隊却多至幾十萬的道理？共產軍中的兵士不必說，共高低級將領（除了最高的林彪外），也儘量用東北本地人，極力避免在土著面前以「征服者」姿態出現，其政治工作人員也儘量是東北人，權柄很大。東北這例子證明：科舉考試制度既廢，「無爲」政治哲學既已被人遺忘，則防止中央向地方身上壓迫而激起變亂之方法，只有由地方人去管地方的事，復在中央政權內讓各地方有份。此之所謂：「地方在地方有權，在中央有份。」

近來看見印度分治案之應時，又迴想英國自從美國革命給了牠一個大教訓後即採用「以放鬆求拉攏」的方法以謀帝國的統一之成功，不禁假然以還吾國中央拉攏地方之不得其法而變亂靡有已止，故不憚煩絮爲言如右。

六月十八日脫稿

教育莫忘羣育！讀書莫忘救國！

樊弘

現在我想劈頭提出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從本年五月二十日以來，全中國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所領導的反饑餓和反內戰的運動，和在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平各專門學校學生所發起的內除國賊外抗强權的運動，像這一類的運動，在枝節上，當然不免亦有感情用事的地方，但是，在根本上，宅究竟是否應當存在呢？關於這個問題的答覆，老早便有兩派名教育家的主張。

第一派名教育家說，高等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獨立的發現眞理的能力和獲得專門知識及技能，以爲異日利濟社會之需。以現代專門學問的博大精深和日新月異，縱令青年學子在求學這段短短的時間內，竭盡全力，專致一學，不爲政治所引誘，不爲時髦所炫惑，日夜孜孜，不輟不休，至於畢業，亦未必能獲得一種獨立研究的能力，或專門的知識與技術。假令在這求學的期內，再爲政治的運動所分心，將這段寶貴的時間來干預政治，結果不但政治管不好，而且連學業也荒廢了。待到畢業之後，屑不能挑，手不能提，既不能靠勞力以爲生，但又無財產的收益以爲助，其結果非當高等流氓不止。這不但對於國家社會無利，而且對於學生個人有害。因此學生運動，在根本上，不應聽其存在，而當予以取締。「最近教育社會兩部，」依據中央社南京十六日電，「以風聞有未經核准之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行會議之舉，……電請上海市吳市長查明依法取締」，其所依據的理由，亦不外說，學生「對外活動不免有妨學業……故決加以取締」。

無論在任何社會制度裏面，青年學生的地位都好比在竹林裏面的一些柔嫩的春筍。假令在暴風疾雨的時候，不幸這些柔嫩的筍芽，因受過度的刺激而夭折，無論從任何方面說，都是未來社會的不可彌補的損失。青年人在今朝應該多作涵養性情並埋頭伏案的工夫，到了將來學成識定之後，再爲社會犧牲可耳。偉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他的晚年的時候，也有類似的意見。這種意見內，含有部份的眞理存在，因他明白的宣言，學生時代的最大的任務，在於陶冶他們的人格與智力。我們絕不能說它是完全錯誤的。

第二派名教育家說，青年學生的運動，在原則上，雖然不應存在，但在政治腐敗的時候，青年學生的運動是必要繼續發生的。所以教育者們應當對他們寄予眞摯的同情與疏導。現任北大校長胡適大師，在民國九年晨報五四紀念刊上所發表的「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一文裏，說得最好：

「簡單一句話，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政府太卑劣腐化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學生界發生的。漢末的太學生，明末的結社，戊戌政變以前的公車上書，辛亥以前的留學生革命黨，俄國從前的革命黨，德國革命前的學生運動，印度和朝鮮

現在的獨立運動，中國青年的五四運動和六三運動都是同一的道理，都有產生的理由的。」

胡適大師，在距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爲時已隔二十八年的今天，再將他的意見，在本年（三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北平行轅記者招待會上，重新强調一番。他說，「古今中外的學生運動都逃不出一條公例，就是政治不能令人滿意，又沒有合法民意機關用合理手續使政治革新，於是這個要求改革政治的担子，就落在靑年學生身上。」由此可見，胡適大師的關於學生運動的見解，乃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最値得我們仔細的研究。他的意見，已經認識了學生運動的必然性，比較第一派的教育家們的閉門造車的高等教育的政策，是更合於歷史發展的公律的。但是在胡適大師的談話之中，似乎亦尙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儘管胡適大師已經認爲學生運動，在「國家不上軌道，又無一合法民意機關監督政府的時候」，乃是一件不可避免的運動，並極力主張教育家們應當對他們以特別的同情與包容。但並未明白的說，學生運動在高等教育的原理上，是否應當存在。必須把這一點認淸後，我以爲，我們對於學生的運動，始有正確的評價。

從高等教育的原理上說，我以爲今日的高等的教育有一個很重要的缺憾，即只知注重智育和體育，但忘了注意德育，尤其是忘了注重羣育。學生運動無疑的可以補足高等教育中缺乏美育這一個環節。爲什麼呢？（一）學生的運動是一種自發的和主動的運動。誠然，在學生運動裏面，不免也滲雜得有主義的成份，或不免也有一、二靑年共產黨滲雜其中。可是，假如我們以爲在學生運動裏面因有相信共產主義的靑年參加，便以爲學生運動是被動的，這可不是事實。回憶在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發生之時，任何黨派主義均未滲入，但學生運動依然爆發。由此可見，共產主義的存在，並非學生運動爆發的原因。正如南開大學教授黃鈺生先生所說，「不錯，這次學潮的口號——反饑餓反內戰——平、津、京、滬、武漢、蘇、杭、全一致，發動的日期也先後相接，這其中必有人主使策動；主使策動容或有之。但我們要問，如果沒有刺激靑年的情境存在，策動何以如此順利？主使何以如此成功？口號如果不是心坎的話，口號如何喊得那麼響？說多數靑年受人利用……這都是不公道的說法。」實則，任何學生的運動的目標都是學生們以學生的立場，向大會公開提出的，並係學生們以學生立場去討論反對和通過的。提出者不必是共產黨的分子。贊成者更不必是他們了。縱令提議者是他們，但這亦絕非上級對於下級的命令，而係他們以學生的立場，從學生的心坎裏，自動的向同學建議出來的。同時我所有一切的議案在討論和表決的時候，更須要透過大多數的毫無黨派色彩的學生的心靈的活動或判斷才行。歸根到底的說，學生運動確是自發的和主動的。這種自發的和主動的學生運動，在積極的方面，可以養成學生從共同利益的觀點，研究國家切要的問題，並在廣大的羣衆的面前，大膽的發表他們的批評和建議的勇氣。辯論是發現眞理的武器，公開是打倒黑暗的武器，這兩種武器都是近代市民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但自發的和主動的學生運動都可以揩植他們。從教育的立場上說，它的價値是無上的。而且消極的方面，學生的運動並可以破除中國幾千年來人與人間的鬼鬼祟祟的陰險的行爲。如這一類的陰險的行爲，其在中國社會裏所發生的惡影響，我看也只有飢饉與內戰纔足以暴露出他們的殘忍與罪惡！

（二）、學生運動是一種有組織的運動。這種有組織的運動，並可以消滅中國幾千年來在士大夫階級裏的獨辦自利的劣根性。孫中山先生，在他的民族主義裏說，中國四萬萬人好比一盤散沙。爲什麼呢？因爲中國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國，更不知有世界。其實中國人的弊病何只只知有家。除了只知有家之外，幾無一人不是只知有政治的小組，只知有金蘭的弟兄，只知有裙帶的關係，或孔宋蔣的關係，和只知有同窗或同鄉的關係等等。偉大的中國今天的分崩與離析，全是被這些狹隘的封建關係製造出來的。學生的運動正可以補足中國傳統的重私交忘公誼的弊害。平心而論，以現在在社會上作事的人的態度來說，好多人都說，在社會上作事的人中，惟獨北大畢業的同學，比較的不注重校友的關係。爲什麼北大畢業同學比較不注重這個關係呢？我以爲，這並非偉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講堂上講授學理的功勞，而是五四時代，偉大的學生羣衆所發動的有組織的運動把它孕育而成。我衷心的相信，將來新中國的任何大學畢業生，當他們踏進社會擔任國家的艱鉅之時，均必比過去北大畢業的學生的態度更偉大，因爲今日學生運動的組織比較五四時代更要偉大的原故。除非中國的教育不要養成學生的偉大的人格和偉大的組織的能力，我認爲，全中國的學生運動，甚至全世界的學生運動，都是値得我們讚美和發揚的。

（三）學生的運動是一種由下而上的運動。這種由下而上的運動在消極的方面，可以打破中國幾千年來官僚政治的一切由上而下的辦法。在積極的方面，並可以培養國民的由下而上的民主政治的作風。正如朱光潛教授所說「民主的主要條件是每個人勇於表現自己的意見，樂於尊重旁人的意見。學校本應是民主訓練的最好的場所。」朱光潛教授雖然指謫現在學校裏羣衆運動的缺乏民主的精神說，「現在學校裏的羣衆運動往往只是官場黨派的惡伎倆的鈔襲。多數人既沒有勇氣表現自已的意見，少數操縱者於是假民主的名號，作反民主的精神底行動」。朱先生很感歎這種不愉快的事情的發生，而以之歸罪於「中國人的劣根性太深，離眞正民主精神還太遠」。我很贊成朱光潛教授這句話，即「學校是民主訓練最好的場所」，可也有一點要補充的地方。假如說，在學生運動裏，還有少數操縱多數的反民主的行爲，那必是由於多數人還沒有養成在公衆面前勇於發表意見的習慣。但這並不是由「我們中國人的劣根性太深」，而是由於一般大學的訓導處並沒有積極的提倡學生的運動或多給學生在廣大的集會裏勇於發表意見的機會使然。民主也如一種課程一樣，除非讓學生多作實際的練習，它是不會熟練的。孟子曰，「人恆過然後能改」。新教育家說，「試驗與錯誤是學習任何科目所必須經過的途徑」。錯誤固然要改正，但學習的機會不可失。多讓學生以集會結社的機會，這個錯誤必定減少。爲了民主，爲了理性，我們無不希冀今日中國的教育家，積極的扶植學生的運動，使它成爲代替中國的官僚政治的初步。

根據以上的三點理由，我以爲學生的運動，在高等教育的原理上，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應該存在的。今日大學的教育既太偏重智育與體育，所以我們必須把學生的運動看做教育的對象，以補今日大學教育的不逮。誠然學生的運動不免要犧牲一部份的學習的時間，但體育不是也要犧牲一部份的時間麼？從教育的原理上說，這個犧牲是值得的。因此，我們站在教育的立場，不應對於學生運動所必要犧牲的時間加以婉惜，而且應當正式的給予。我們必須站在教育的立場，把學生運動認爲是教育的對象，對於學生的運動完全立在鼓勵和指導的地位，方纔能夠糾正學生運動所犯的錯誤。如此說，學生的運動在原理上不應罷課，不應彼此打架和漫罵，並不應以多數脅迫少數，並應當努力作成羣衆運動的楷模，凡此均必須要教育者站在教育的立場去鼓勵和指導纔行。當然學生自已亦應當努力避免上述的缺陷，方纔不至貶損學生運動的價值。我誠懇的建議，在每個半月內，在大學的課程表上，留出半天的時間來，並擇定一個偉大的民主的廣場，專給學生們來作公開的演說。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可以演說，相信牛克思主義的亦可以演說。喜歡和平的人可以演說，喜歡戰爭的人亦可以演說。相信科學萬能的人可以演說，反對科學的人亦可以演說。這些公開的演說都可以讓市民來聽講。也可以讓市民聽講人自由發問。但由學校擬出一定的公開演說的規律，來讓大家共同遵守而已。這樣一來，我敢相信，凡大學生均可以養成一種在公衆面前，公開發表意見的技能與勇氣。由是，少數脅迫多數的反民主的行動，便可因多數的覺醒和他們的判斷能力的增加，而受致命的打擊了。這樣一來，學生的活動定當成爲民主運動最好的楷模，並必對於社會發生良好的政治教育的作用。但是這必須要學校把學生的集會看做教育的對象，並必須學校注重教育，方纔敢於來領導這個偉大的教育的工作。但這却是今日中國的教育所必需的。

記得蔡元培先生在五四運動時，對於學生運動的名言是，「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蔡先生這一句話，已經明白的承認學生運動在教育上的意義。但可惜他未能站在高等教育的立場，正大光明的把學生運動看做教育的一部份。可是，今日的大學教育確是必須正大光明的承認學生的運動應爲教育中的一部份，方足以適應民主政治的需要。因此之故我特建議，把蔡先生這兩句話，依照蔡先生的原意，大胆寫成下面的這個新形式：

教育莫忘教育！

讀書莫忘救國！

我應很坦白的說，我並非研究教育的專家，凡所發表的意見，都只是一種外行人的看法。世有專研高等教育者倘希有以教我。

三六．六．廿一　於北京大學

定閱諸君：如續訂、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

爲本屆大學畢業生進一言

任鴻儁

本屆畢業於大學的同學們，他們兩年的光陰在抗戰期中，又約一年的時間在復員中渡過，其餘的僅僅一年的時間，算是比較平定的日子。在這樣災亂紛乘，擾攘不寧的時期中，他們能修完四年的課程而畢業，已經是難能可貴了。尤其難得的，是他們經過這四年來艱難困苦的鍛鍊，孟子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張橫渠所謂貧賤憂患，玉汝於成，皆是他們特有的權利。所以我們對於本屆畢業的同學們，要向他們敬重地道賀。

不過，話說回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時局所能給予我們的好處，遠不及它給予我們的困難的多。我們這一班初出茅廬的勇士，誰能不望着前途的荊棘險阻，而徬徨無措呢？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不是又有人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嗎？我們的抗日戰爭方告結束，不是又在進行內戰嗎？物價不是正以沖天之勢逐日高漲嗎？生活不是一天比一天困難嗎？本來大學生畢業即有失業的恐懼，現在這個恐懼更有成爲事實的可能，那末，我們本屆畢業同學應該怎樣自處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想提出一點意見，以供畢業同學的參考。

第一、要有自信心。此處所謂自信，不是妄自尊大，也不是固執傲慢，而是相信世界上一切困難無不可以人力去克服。羅斯福在一九三三年就任第一任總統時，就美國的經濟恐慌發表演說。他說：『現在甚麼都不足令我們恐懼，最可怕的乃是恐懼的本身。』這是教人不要失去了自信心而成爲失敗主義者。大學的同學們，在求學的時代，不是早以天下爲己任嗎？那末，出了校門之後，尤其應該對於國事及社會問題，出以積極的態度，不要輕易流於悲觀與頹放。古人有一句名言：不遇盤根錯節，不足以別利器。我們在這個萬方多難的時候遇到的一切困難，正是發揚我們特殊才能的好機會。唯一的問題，是你的自信怎樣？

第二、要時時自省。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自省是我們進德修業的不二法門。上面我們說過，艱難的時事，是鍛鍊能力的好機會，可是也有黑暗的一方面。譬如說罷，在抗戰的期間，學校設備的不完備，環境的欠安定，以及求學情緒的缺乏專一，都使我們的學業成績，比平日要打一個折扣。這在本屆畢業的同學們也許自己不覺得或不願承認。但你們如其和你的前輩們一同考留學試驗或其他高等考試你便知道上面的說話並非無病的呻吟。好在學問之道，本來是無止境的。大學畢業也不過得到一個開闢學術門的鑰匙。只要時時自省，時時感覺到不足，則學問智識的長進，自然不但能彌補以前的缺憾，而且會有新的進步。總而言之，大學畢業，即使最好的成績，在求學也不過剛才發軔，在作人也不過才立下始基。這時時反省以求學問修養的進步，是必不可少的。

以上兩層是就個人的態度而言。至於將來出而任事，對事態度應怎樣，我們也不妨提出一二點以供參考。

（一）要有所不爲。孟子說：『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這句話眞是見到之言。無所不爲的人，必定無宗旨，無目的，專門取巧投機，少勞而多獲。結果不但自己一事無成，而社會事業也就敗壞於此種行爲之中。所以要有所爲，必先決定甚麼應該不爲。就淺近的說，如無謂的酬酢，酒食徵逐，人人知道是曠日廢時的事，但能不隨波逐流的有幾人？其次則學習專長的人，往往不擇事而就。故有學工的去管稅收，學物理的去司筆札。這樣用非所學，自難望有好的成就。至於立身行己，具有本末的人，有許多事根本不在考慮之中。如孟子所說：『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若今天大學畢業的同學們也能學孟子來一個堅決的自誓，說：『以友作利，營私害公，我得志弗爲也。』我相信將來國家的受益必非淺鮮。

（二）不要看不起小事。新畢業的同學各有各的未來理想，空中樓閣，對於低下一點的位置常常是不屑屈就。據我看來，此乃是一種錯誤。就事業的次序說，我們以爲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乃是成功的途徑。我們當

見有些不幸的青年，因爲生長在特殊階級之家，一步登天的做了甚麽機關的首領，而結果他所做的事業多半是失敗。這種例子太多了，我不必一一的舉出。反之從低微起家而失敗的人，我們還未曾見過。古今中外的許多大人物，都是從微賤職業出身。我們的孔子，就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而近代大發明家如愛迪生，曾做過賣報的童子。新近死去的美國汽車大王福特，也是從一個小小的機器工匠做起。這些都可以證明不恥小事，正是做大事的一種訓練。順便說一句，小事當然比大事多，競爭也不如大事的激烈。故如不看不起小事，失業的恐慌也就可以少些。

（三）不要以手段當目的。人生目的，本來是最難講的一件事。不過大學生既受過高等教育，我們總不能說他們只是如平常人的夢夢然而生，懵懵然而死，而必定對於人生目的，必定有一個交代。這個目的必定爲人的、遠大的、以全社會人類的福利爲究竟的，而非爲己的、個人的、以狹小的團體的利益爲歸宿的。因爲如其是後者，很難稱爲人生的目的。目的既定，手段自然有種種不同，要緊在不要以手段當目的。如人追求財富，財富決不是目的，但可以爲造福社會的一種手段。如只顧追求財富而忘卻社會的目的，則其人必將成爲守財奴，不但於社會有損，於他自己也未必有益。又如玩弄政治，目的無非是要造福民衆。但如得了權勢，而所作所爲反足以塗炭生民，流毒社會，則失其政治的目的，而僅爲貪權怙勢的小人。甚至研究學術，潛心藝術，設若不把目的手段，分別清楚，則科學可以殺人，藝術可爲欺騙之具。大學教育的成功失敗！可以說亦以畢業同學的運用目的爲分水界。故希望對於此層特別注意。

以上所說，都是卑之無甚高論。不過在這世亂紛紛的時候，我們以爲唯有穩紮穩打，先從淺近的在我的做起，方不至對於社會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畢業諸君當不河漢斯言。

評方顯廷先生的經濟觀點

——論當前經濟危機的根源

笪移今

一

最近方顯廷楊蔭溥等十先生聯合發表了一篇「解除外匯管制與搶救當前經濟危機芻議」，對於開放外匯所提供的技術性的意見，雖能切合工商界的要求；可是他們對於中國經濟危機的基本認識，却未能正視現實，流露着避重就輕的觀念。根據此種看法所設計出的辦法，勢必收效有限，不能全盤解決問題。

由於對經濟問題的看法不同，有人認爲中國經濟危機，是一通貨問題，只要停止通貨膨脹，只要實行幣制改革，便能解決經濟困難。又有人認爲中國經濟危機的病源，是個交通問題，只要交通能恢復，只要物資能暢流，便能刺激生產，促進繁榮。更有人認爲目前工資過高，危害工業發展，工資是生產中最主要的成本，只要工資降低，工商業便有轉機。這些論調，雖各言之成理，但都是從各個角度來看問題的，沒有把握經濟全局，沒有抓住問題中心。經過一年多的理論商討和事實印證，已經得出一個爲多數人所共認的結論，即中國經濟危機，是仍然執行「戰時的經濟政策」的結果。換句話說，政治問題未能獲得合理的解決，乃是經濟危機的主要根源。從不斷論爭中歸納出來的這個基本概念，已激起各階層的共鳴，已烙入人民的心底。「反內戰，反飢餓」的學生運動，得以普遍獲得熱烈的響應，得以迅速匯爲澎湃的巨流，就是因爲這種呼聲，在本質上是搶救經濟危機的緊急號召，是人民要求活命的正義控訴！

戰爭給社會帶來了不安，給人民帶來了飢餓。人民從苦難的經驗中，認清了危機的癥結，正在一致要求停止內戰，正在全力要求實現民主和平。方楊諸先生也感到「時機如此緊急」，不得不站出來發言：「或說今日經濟危機的造成，是由於內戰，內戰不停，則沒法解除經濟危機，我們自

然不能完全否認這一說法；不過將經濟政治攪在一起，把今日經濟的僵局，全部推在政治身上，亦頗有商榷的餘地。就拿我們研究經濟的眼光看，目前中國的經濟，果施策得當，執行澈底，還是有辦法，而經濟僵局一旦打開，政治苦悶至少可局部解除……在一切問題解決之先，就經濟而言經濟，亦不是完全沒有辦法。」（「解除外匯管制與搶救當前經濟危機芻議」見六月十四日申報及廿四日大公報）。這段話說明兩點：（一）挽救當前經濟危機，不必諉待政治問題之解決；（二）在現狀下，解決經濟危機也是有辦法的。在今天，擺脫政治而單談經濟是否妥當，以及方先生近來種種建議，究否能解決今日極複雜的經濟問題？確有商榷研究的必要。

二

把中國經濟問題當作政治問題，兩者無法獨自解決的理由，可分四層來說明：

首先就危機的本質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在於商品過剩，物價下跌，生產萎縮，失業增多，飢餓騷擾。這種混亂情形，經過相當時間之後，又會逐漸趨於繁榮。繁榮到達頂點，隨之而來的又是危機。如此週期替變，是資本主義生產無可逃避的自發現象。反之，我們是落後的經過八年苦戰的農業國家，當前經濟危機不同於先進國家的特點，在於物價狂漲，一方面是貨品缺乏，他方面又是生產不足，尤其農村破產，使大多數人民都陷於飢寒的悲慘境地。毫無疑問，這是戰爭造成的結果。為了戰爭，政府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支出仍為應付軍費，紙幣仍在無限的繼續發行，物資仍在大量的被炮火吞滅，人力仍在源源為前綫而動員。大規模的自殺行為，愚蠢的瘋狂舉動，籠罩着全國，怎能不把經濟推入崩潰的深淵？所以，今日中國經濟的危機，顯然是人為的，政治的。資本主義的循環理論，並不能完全解釋當前的經濟事象。離開政治而言經濟，絕不能使問題獲得合理的解決。

其次，就戰後經濟看，方先生也曾說過：「不僅因復員的零亂和遲緩，延長了人民的痛苦；更不幸地是內戰接踵而起，戰後國家財政情形比戰前更趨惡化，使中國經濟失去復興的機會，反愈漸步步走入危險的道路。」（見經濟評論一卷六期「中國經濟危機及其挽救途徑」）。去年全國中小工廠停頓者達四分之三，一般工業生產及能力僅戰前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今年以來，「本市工廠商號，受工業原料缺乏、高利貸及二三萬倍的生活指數影響，前途困難萬分，均相率停工倒閉，每月停業數字，是與日俱增……一月至六月廿五日之間，廠商撤銷數字，除向社會局登記的九十六家以外，尚有許多沒有登記的……國民經濟走向下坡。」（見六月廿九日上海和平日報）。東北華北因內戰擴大，工礦事業大都遭受破壞，損失尤為慘重。至於農村，整個北中國的原野，已變成了血跡斑斑的戰場，民不堪命。南方也因征丁征糧的苛繁，瘡痍滿目，到處淒涼。解除農民痛苦，須要立即停止對農村的軍事破壞，廢止對農村的一切壓榨。而「正當工商業的經營，須有安定的經濟環境，交通運輸暢通，消息靈活便捷，企業家能作長期的打算和計劃，才有放手經營的可能；在目前混亂的狀態下，正當工商業實無法進行，結果是工不如商，商不如投機。」（見同上方先生語）。毫無疑問，這又是戰爭造成的現象。戰爭不停止，「混亂的狀態」便沒有改善的可能。混亂的狀態既不能終止，農工生產事業就無法發展，人民生活就不會安定，危機必將繼續擴大加深。對症下藥，必須先解決政治問題，而後才能逐漸由黑暗的現實中，望見光明的繁榮前景。

再次，就經濟政策論，中國弄到這種油乾燈草盡的地步，人多歸之於經濟政策的錯誤，是有道理的。但是經濟政策為什麼會有錯誤？這是政權本質所決定的。以犧牲多數人民利益而肥胖起來的「既得利益集團」，對中國政治和經濟，早已取得了堅固的控制權。政治上的一切措施，經濟上的各種辦法，莫不以維護少數富人利益為鵠的。有時，為要和緩人民的責難，雖亦偶然實施一兩項比較合理的方策，然而由於各級機構的官僚化和行政效率的低落，人民很少得到實惠，甚至反為官僚們多添了舞弊機會；例如商業坊案，幾次金潮案，就是最好的說明。要使經濟政策合理，要使政策能兌現，端賴建立為人民服務，受人民指揮的民主政治制度。只有真正的健全的民主政治，才會訂頒進步的經濟政策，才會提高行政效率。同時，今日國民經濟中最基本最切要的問題，是在如何復興農村，如何解決土地問題，如何實現孫中山先生的遺言——耕者有其田。國民黨執政二十年，平均地權的口號，天天掛在黨要權貴們的嘴邊，從未見之絲毫實行，又是什麼緣故？這是因為貧苦農民不能使行政權，政治為少數特權份子所

把持，當然只顧及了地主利益，而不會爲多數農民打算。蔣主席於三十四年五月在參政會，同年六月在國民黨一中全會，一再表示對於土地兼併和資本不合理集中的現象，對於發國難財的暴發戶，決心剷除。不幸，這種財富偏在的情形，因有腐敗的政治作祟，在抗戰結束以後，更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各種經濟改革，如不從促進政權民主化做起，則一切努力，恐皆枉然。

更次，就爭取外援言，挽救當前經濟危機，主要固然是靠自力更生，但爭取外援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主要條件，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富國，爲要解決其過剩商品與過剩資金，極希望在中國擴展商品市場，開闢投資園地。早在日本還未投降之前，美國朝野就不斷計劃着在戰後如何幫助中國開發經濟，建立一個近代化的新國家。現在戰爭結束已經是二十個月了，有利於美國的中美商約也簽訂過了，美國對華建設性的經濟援助，還是遲遲未來，還是抱着觀望態度，主要原因就是中國大局不安，政治未上軌道。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對華政策聲明，要求中國取消一黨專政，停止內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聲明中更剴切地指出：「中國如能照這樣路綫走向和平與團結的時候，美國準備以各種合理方法，援助國民政府，以重建國家，改善農工業經濟……在推進這類幫助之中，對於中國在合理條件之下，爲了用於中國全國的健全經濟及中美間的健全貿易的發展，而計劃的向美要求信用貸款及借款，美國準備加以有利於中國的考慮。」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杜魯門堅持原有的立場，再度發表對華聲明，大意說，吾人準備援助中國，惟須中國趨向和平及組織眞正民主政府。最近美國環球飛行記者團在上海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關於美國對華貸款，乾脆地告訴我們：「中國能趨於團結及停止內戰，則美國極願對中國之經濟有所幫助。」（見六月廿六日上海新聞報）。美國爲求投資的安全保障，爲求貿易的順利發展，朝野一致要求中國能團結和平。在美蘇關係沒有進一步的惡化，在國內軍事沒有形成一面倒的局面，和平團結乃是美國對華經濟援助的前提。將近兩年來的混亂情形，美國感到失望，轉而全力去扶助日本，對中國前途是一極大的威脅。

三

以上主要在說明解決經濟危機，必得以解決政治問題爲先決條件，這是我們對當前經濟危機的一個根本認識。以下再就方先生所提出的搶救危機的辦法加以分析。

第一，方先生認爲當前經濟危機已到了非搶救不可的境地，應該立刻拿出確切的辦法，立刻見諸行動。於是便聯名請政府「趕快開放外匯市場，搶救當前經濟危機」。以「研究經濟的眼光」來處理經濟危機，不從生產方面來看，而從流通方面或交換方面來看，在理論上確「頗有商榷的餘地」。其次「芻議」要求解除外匯管制所列舉的辦法，我們也認爲比現行制度爲優。當局倘能採納，或可暫時改進目前貿易狀況，因爲「變」總比不變要好些。不過如以爲外匯交易恢復自由以後，就能挽救當前經濟危機，未免高估了外匯開放的作用，未免把中國經濟危機看得太爲單純。正如千家駒先生在論貿易改制一文說：「變一定是要變的，但『變』而能否『通』，却不無疑問，因爲中國經濟問題的癥結是內戰。內戰不停止，任何辦法都如隔靴搔癢，決不能挽救經濟崩潰的狂瀾，這是一個客觀的眞理。」（見六月九日香港華僑日報——管制貿易非改弦易轍不可）。

第二，方先生另一個以經濟而言經濟挽救危機的具體辦法就是：「在今日實在應該徵收財產稅了，徵收的方法，可先從各種財產分別入手，如黃金財產稅，外幣存款財產稅，有價證券財產稅，房地產財產稅等，這些財產容易察出，所以容易舉辦，然後再徵及綜合財產稅及財產增值稅。如此，就是內戰打下去，誠如本期周舜莘先生所言，戰費也有着落，同時可免除游資投機工商業的壓迫。」（見經濟評論一卷六期）。話說得再明白也沒有，徵收財產稅可以抵付戰費。推而論之，通貨膨脹也可因以停止，物價也可因以穩定，經濟危機也可因以解決。這種想法單就徵收的技術而言，便大有問題，而現存的政治機構，也沒有能力負起這項責任；而且財產稅收入有定，戰爭消耗無窮（方先生也承認內戰短期內也解決不了問題），這又怎麼辦？再看社會財富分配，十年來財富已集中到少數豪門、官僚、買辦、投機份子手中，全國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都已一貧如洗，政府是否有勇氣向「既得利益集團」徵收財產稅？何況這些人的財產大部份以外匯、黃金或其他方式保存在國外，又用什麼方法去徵收？據說財政部已擬就開征財產稅的辦法，規定凡有田地五十畝以上，有地產三千萬元

以上，財產三千萬元以上的人，都要開徵財產稅。隨着通貨之不斷膨脹，幾個月之後，連一般公教人員和薪水階層，都會變成三千萬元以上的「財主」；財產稅的徵收，勢必又以中下階層爲徵稅的主要對象。這樣看來，人民在忍受通貨膨脹的掠奪之外，又要蒙受一層苛重的榨壓，這顯然是中下階層的新災難。還有，財產稅倘眞像方先生所想的那樣用之於內戰，那就不是挽救經濟危機，簡直是在加速促進經濟總崩潰。

四

把方顯廷先生近來對中國經濟危機的認識加以檢討，好像有過三度變化。記得方先生在「評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一文中，闢頭就說：「我國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內戰」。又說：「目前情形，完全靠發行來支持內戰，此次經濟緊急措施辦法能否生效，關鍵要看內戰能否停止……我們願重複說一遍，我國經濟要眞有出路，就非得及早停止內戰不可。」（見二月二十日上海大公報）。這是極客觀合理的診斷。其後方先生又撰「中國經濟危機及其挽救途徑」，此文在一般分析中仍未輕視內戰對經濟打擊的罪惡，但在觸及問題核心時，却認爲目前經濟危機之由來，一方面是由於戰亂和戰爭的直接破壞所致，一方面是由於政府財政經濟政策的不合理。不把戰亂和戰爭看爲經濟危機最基本的原因，和八十天之前說過的話有些不同了。及至領銜發表搶救經濟危機芻議，更完全改變了自己最初的看法，認爲政治問題未解決之先，果施策得當，執行澈底，還是有辦法打開經濟僵局。奇怪，難道方先生眞不明白財政經濟政策不合理，施策不得當，執行不澈底，是戰爭和官僚政治的必然產物嗎？

在短短三個多月內，一位著名經濟學者的思想，變化得這麼快，令人難解。如從時間方面來看，方先生的思想變化，似乎又構成了三種巧合，即方先生在寫「評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時，還是一黨專政，撰擬「中國經濟危機及其挽救途徑」時，已是以張羣氏爲首的三黨施政，發表「解除外匯管制與搶救當前經濟危機芻議」時，正是行政院向全國經濟委員會提出經濟改革方案。是的，正在審查中的經濟改革方案，容納了不少民間意見，中報、正言報、金融日報等亦皆予以相當好評。不過，令人掃興的是全國經濟委員會初次討論這個方案時，潘序倫先生當場「對於該方案究竟能否收效，表示懷疑。」（見六月廿七日上海大公報）。離開政治，以經濟而言經濟的辦法，在目前的中國，恐怕畢竟是行不通的主觀想像。

當然，在政治問題沒有解決以前，我們並不反對一切局部的可能的經濟改進，及爲爭取這個改進的一切努力。只是當經濟危機演變到崩潰的階段，經濟問題已變成嚴重的可怕的社會問題，除了立即實現民主和平而外，任何辦法，都是枝節應付。嚴仁賡先生說得對：「在目前這種政治情況下，經濟學者尙自覺有根治危機的把握，是自欺欺人，有意無意之間替內戰作了掩護……如今，已是千鈞一髮之勢，人民忍耐限度已到了盡頭，經濟學者，至多只能給它打一打強心針。」（見經濟評論一卷十二期：經濟乎政治乎）。因此誇大了強心針的效果，乃是不忠於眞理的浪費論爭，不忠於社會的無益欺瞞。

變一點·孩子！

——美國人性格之六

費孝通

『什麽情形之下，一個人可以用武力來對付別人？』不同的文化對這問題有不同的答覆。

有的認爲用武是最後的決定是非的方法，所謂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弱肉强食，是生物界最基本的原則。這種看法把生存視作惟一目的，武力是獲得生存的手段，所以武力本身是道德的。我們記得尼采曾認爲基督所代表的道德標準是弱者的護身符。這世界應當是强者的地域，如果被人欺侮，那是因爲你自己弱，弱的本來不配在這世界上生存下去。侵略是選淘汰弱的作用，是合理的。勝利是强者的報酬。

有的却剛剛相反，認爲武力根本是要不得的。用武本身是罪惡。基督說人家若是打你左臉，你把右臉也給他打。這種看法裏包括着一種道理：

人和禽獸是不同的，人是有社會的，社會的形成有賴於合作，共同的生存才是道德的基礎。個人不能以威脅別人的生存取得自己的生存，因之，侵略是反社會的不道德的。人家如果用武力來侵略我，我也用武力來抵抗，我固然可以防止被害，但是我同時也承認了武力在人和人關係中的地位。這承認也就威脅了社會所賴以生存的原則。武力來，武力去，結果道德的基礎必然被否定，而回到了人相食的禽獸秩序中去了。不主張抵抗，是因為用來抵抗的武力本身就可以成為侵略的武力；要確立人類社會，必須取消武力。甘地厭惡武力提倡無抵抗主義就是從這種看法中引申出來的。

在這兩極端之間，還有着各種程度上不同的答覆。事實上極端的看法是不能徹底的。原因是在我們所處的人羣中並不完全是以利害相結合的，也並不完全是以道義相結合的。Jack London 所描寫的「浪狼」船上那種以力的平衡來維持的局面，本來是少見的；但是「鏡花緣」裏的君子國也同樣屬於一種想像——至少現在的世界離開這理想尚遠。在現實生活中，人和人的關係免不了有時要用武力，但是也不允許武力成為通常維持人和人關係的手段。因之，每個文化對付我上述的問題所具的答覆，大多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而且都是早年教育的一個主要項目。

我們做父母的人，無時無刻不就具體的情境，去指示孩子們什麼情形之下，用武力來對付人是不應該的，什麼情形之下，不用武力又是不應該的。譬如說，我的孩子從學校裏回來，哭着說她的皮球給她同學搶走了。我毫不思索的向她說：「沒有用的孩子，給別人搶了皮球，還要哭！」意思是很清楚：自己的財產是應該自已保護的。人家用武力來搶就該用武力來保護自己。很顯然的，我承認武力本身並不是壞的。應當不應當是要看情形。我的孩子還哭着說她告訴了老師，老師沒有保護她。我又隨口的說：「真沒有用，我最不喜歡有人一來就告訴老師。有本領的，人家不敢來搶你。」這句話我又無意中指出了倚賴別人的權力不如依賴自己的能力，祇要應當的時候，武力是比其他辦法更可靠，更可貴。——我們就是這樣在傳遞我們文化中所規定下對於用武的態度。孩子們從這些不經意中對具體情境的反應裏，學得了做人的態度。

我上述對孩子的反應，也許並不代表我們中國傳統的規矩。我記得我小的時候，凡是和別的孩子有爭執，動了武，給我的祖母知道時，不論我為什麼打了人，總是派我的不是。她會說：「君子動口不動手。誰動手就是誰不是。」她有時也知道我是委屈了，她會安慰我說：「我們不和他們一般見識，他們那些野孩子不講道理，我們可不能。讓讓他們就得了。」她會接着賠償我的損失，我的氣也平了。這是我們傳統禮讓社會的正統方式。我想到了自己對孩子講的話，不能不覺得我們文化的確是在變了。

在我們的禮讓社會中，君子是不動手的。魯迅把阿Q式的精神勝利描寫成了一種懦怯的心理掩護。這在現在的情境裏也許是事實，但是在傳統的社會中也不盡然。不動手的贏得社會同情的手段，表示自己理直。中國的傳統社會是富於社會壓力的，在社會爭執中不鼓勵個人間的直接解決，而要訴之於社會。在小學校裏老師最怕的是聽取學生們的「告訴」。大一些，吃講茶。更大一些，我們會一味的等國際仲裁，我們可以請馬帥來調解，那是一貫的。我有一次在美國某一個討論會上，聽到有人責備我們中國把國聯太看得認真了，以致國聯的紙老虎在東北事件中被人戳破。我聽了覺得很奇怪，我反問，我們依賴國聯來判斷是非是尊重國聯，怎能說是我們的錯誤呢？他們也很奇怪的聽我這樣說：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怎樣推給國聯，你們希望別人替你們打仗麼？——這裏我看到了基本文化的差別了。我記起了祖母的教訓；也使我在我自己孩子失了皮球，我向她說了上述的話之後，默想了半晌。

在有着有效的社會壓力的社會裏，不動手是爭取勝利的手段，因為不動手是表示講理，也就表示了有理，動手的人會受到社會的制裁，至少社會會給受欺的一方面其他的報酬。阿Q的不幸是因為社會壓力已經無效，他所得到的也祇能是他個人的精神勝利了。在一個還沒有國際制裁的秩序裏去依賴國聯，結果也祇成了以大好江山去換取國聯的崩潰，於已於人都沒有好處！

經過了多少現實的教訓，我們這一代做父母的已經和我們祖母不同了。與其說是受了西洋文化的影響，不如說是我們對於自己傳統的否定。在西洋文化中，各國對什麼情形下應該或不應該用武力的問題的答案還是不同的。德國的黷武主義是個極端，我們且不論，單以英美而論，他們也不一樣。

英美相同，而和我們傳統社會不同的，是並不把動手用武一概加以否定。君子也可以動手，但是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他們所謂 fair play。這個字我直接用原文來說的原因是在實在不容易翻譯的緣故。這字有一點像我們的禮字，但是禮字下面我們可以與一個讓字，而 fair play 却比較積極

．可以跟一個爭字。在禮字裏我們不能有動手的，而 fair play 却帶着充分的動作，用武也是動作的一種。這字又近於宋襄之仁的仁，宋襄公要等人家過了河，排定了陣勢，才開仗；這是說打仗也得和競技一般須有規則的。不按規則而打敗了人也不算英雄。宋襄之仁後來被人視作愚不可及。其實也不盡然。他想統治天下，他明白天下不能以力統治。因之，即是在用武來達到這目的時，他也得在道德上同時征服人，否則軍事的勝利將會毫無結果。Fair play 也包涵這意義，不按規則得到的勝利是道德上的失敗。英美人說日本是野蠻而不說德國是野蠻，那是因為德國是宣戰的而日本是偷襲的。

單是有規則的用武還沒有說明 fair play 的意義。它還包含「不欺弱」的要素。大人打孩子是不 fair，強者欺弱者是不 fair。Fair 必須是在用武之前，相打的對手都有勝利的機會，旗鼓相當，才能在 play 中比個高下。再進一步說，操勝算的人是不該挑釁的，一定得比較不易得勝的一方求戰，架才打得成。向強者示威才算是勇，向強者抵頭，欺侮弱者，在他們眼中是懦夫。

在英國，孩子們動手用武認為是本性，長者的責任是在教他們打架的規則，使衝突成為 fair play。他們看見兩個孩子在打架，他們注意的是他們打得合不合規則。「你不該打他的腰部，拳頭得向上。」「他比你小，你怎能回手呢？」「拉人家頭髮，成什麼樣子。」打架也有禮貌，打輸不要緊，人家不會笑你，可是打了人家腰部，撕了女孩子的衣服，却會不齒於同伴。

美國的父母却沒有這樣簡單。英國可以講規則是因為所有的人大多接受着同樣的規則。一個嬌弱的孩子如果不去向人挑釁，沒有人會去欺侮他的。Fair play 多少掩護了弱者。美國不然，因為他們各人的來歷不同，文化複雜。社會上並不全是接受同一規則的人•他們有被壓迫而不甘服的黑人，有性情燥急，感情旺盛的中美僑民。他們有德國人，有法國人，什麼人都有。如果父母不獎勵孩子變一些，成個他們所謂 tough guy，孩子在外邊是很會有被欺侮的機會。而且我們也不會忘記，他們的孩子都是預備拋井離鄉的。早年他們向着陌生的荒原去開發，不要說禮貌，甚至法律都靠不住。英國人無需獎勵孩子們蠻一些，而美國人却得先有此準備，甯可備而不用。美國和英國一般有着 fair play 的傳統，但是還得有應付 unfair 的襲擊。因之，他們同時特別重視自衛。「你得回手！」「誰叫你給人欺侮的，為什麼他不去欺侮別人而單欺侮你呢？」在這方面說，很有一點像我教訓孩子時的態度。可是美國人的自衛却須和 fair play 相聯結起來。動手用武祇限於必要的時候，就是說，必須是別人先動了手，而且還得要對方是個合格的對手。所謂合格的對手就是你和他打時，誰勝誰負在事先是說不定的。如果是一個年齡小的，一望而知比你弱的，即使他打了你，你不能認作挑釁，和他認真。至多給他一些教訓，不能構成真的打架。最好是你笑一笑，搖搖頭，說一聲：「朋友，你看錯人了！」就算了結。你也不妨虎他一下，如果你認了真，在美國人看來，是輕舉妄動。

英國人可以認輸的。挑釁的既然要在太歲頭上動土才算 fair play，失敗也表示勇敢，無所謂。如果自己量力不去挑釁，自然更可安於弱者，避免弱點的暴露。英國有一點能屈能伸，他們有能力自己笑自己。逼緊了可以拚一下命，拚不過，認輸，等一下再說。敦克爾克大敗之後，德國恥笑英國人不敢出來應戰，邱吉爾回答說，「還有什麼了不得，英國本來是隻龍蝦，脫了殼，就得躲在石頭裏，等殼長硬了，才再鑽出來。」

美國是個不能敗的國家。人家打了你，要是服了輸，那就算是懦夫了。對手如果是旗鼓相當的人來挑釁，你必須應戰。但是在應戰前，又必需證實對手確是旗鼓相當的。美國是不能先動手的。可是，動了手却不能服輸的。羅斯福早就料到美國不出頭參戰，歐戰是不會了結的，而且民主國家可能會失敗。美國人中和他一樣看法的人並不是少數，可是羅斯福並不能在日本襲擊珍珠港以前向軸心國宣戰。有一次生活雜誌上發表過一篇敍述珍珠港事件的文章，裏面甚至說，羅斯福如果要防止這襲擊是很可能的，可是他並沒有防止，說不定是他要誘敵襲擊，使他可以參戰。這篇文章是否正確是另一問題，我們很可藉此看出，在一般美國人看來，日本襲擊珍珠港，給他們解決了一個矛盾。什麼矛盾呢？那就是我在上邊所分析的，人家不先動手，自已不能動手的傳統。他們久已預備動手了，但是這傳統遏制着他，人家打上了門，於是可以不顧一切的「自衛」了。

美國會不會再打仗？這是大家現在想問的問題。有人說，美國人民都不願打，所以決不會有第三次大戰。這理由不一定正確的。假如有人去挑釁，先動了手，他們不願打仗的人，一分鐘裏就會跳起來從軍的。至於有人以為美國會在別人沒有原子彈之前先解決別人的，那是一樣不正確的。這和英美的傳統太不合。即使少數人可以作此想，大多數人民不能接受這種不合傳統的戰事的。

有沒有人會像日本一般的打上門去？那是另一問題。可是從美國人的性格上說，整軍經武，有備無患，不會疏忽的。他們對於「自衛」有着特別敏銳的感覺。但是自衛不就等於求戰。他們找不到對手，或是對手耐得住，不先動手，第三次戰爭是不易出現的。

園果的人無

旗下員動

不，拋過來吧！

觀察通信版

從四平之戰看東北前途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瀋陽通信）在近代史上，東北已成爲一個悲劇的舞台。中日之戰，日俄之戰，九一八事變，使東北這塊土一直沒有洗掉血腥的氣味。勝利後接演內戰，自相殘殺，更是有血有肉。一年半以來，東北經過兩次大血戰。第一次是去年五月，國軍用「口袋戰術」攻取四平，佔領了長春。共軍主力退過松花江以北，於是兩黨交兵，松花江爲界了。等二次就是今年五月，共軍以「突破重點，越點前進」的戰術，渡過松花江，包圍長春、永吉，佔公主嶺，圍四平，一度要攻瀋陽。緊張，緊張！六月中旬國軍有援軍出關，緊張局面稍稍緩和。

共軍戰畧　突破重點　越點前進　逐一吃掉

此次共軍於五月十一日發動攻勢，政府方面說這是共軍的第五次攻勢，動員兵力約卅萬人。一週之內，共軍越過農安、懷德兩縣，迂迴長春，切斷了中長路，最後包圍了長春。同時另派大兵突破吉海路（吉林到海龍）指向東豐、西豐、西安三縣。梨樹方面的共軍也出動，目的要幹掉四平。又是用迂迴戰術，先攻佔四平以南的昌圖開原兩縣，六月上旬四平也被包圍了。瀋陽吃緊，人心惶惶。平齊路增加軍次，送官員眷屬入關。安東國軍自動放棄，集中兵力於瀋陽外圍，一面防守，一面待機反攻。遼南的空虛，又給共軍一個北進機會。瀋安線的本溪一度失守，中長路南段蓋平失守，營口曾受過威脅。六月廿一日孫立人由南京返瀋。廿二日熊式輝杜聿明召集軍事會議，同時援軍也陸續出了關。廿三日孫立人飛長春，鄭洞國赴鐵嶺，國軍要向四平展開反攻。當日收復了昌圖開原兩縣，本溪也收復，中長路北段國軍越過公主嶺，南北夾攻，圖解四平之圍。如果四平之圍解開，東北大戰或可暫告結束。共軍的主力可能東西分退，不會再老遠的跑回松花江以北去。往東退可保持遼吉黑的走廊，而且可使遼東南與北韓連接。往西退可保持遼熱走廊，並能威脅北寧路。這次大戰給人民的經驗是：不論誰在背後支持中共，中共戰鬥力之逐漸強大是事實。若再以過去的尺度來衡量，大錯特錯。「突破重點，越點前進」，「逐一吃掉」，也正是中共在東北使用的新戰法。這次戰爭幾乎使政府在東北的佔領區全部捲入炮火漩渦，還不算可怕。等到今秋，青紗帳起，共軍若再來一次攻勢，那纔更可怕，更悲慘，更不簡單。

田園荒蕪　秋收無望　饑饉將臨　哀我子民

在戰爭中首先遭毀滅的是農村與人民。飢餓，逃亡，這是東北人極熟習而又有經驗的課題。這次東北大戰，北起松花江，南到鴨綠江，戰線六七百里，面積有廿六七個縣，人民死在砲火底下的少、死在炸彈底下的多。誰不怕當砲灰？六月卅日中央社瀋陽電，不是說：「空軍健兒此次之表現，較諸抗戰時有過之無不及」嗎？逃哇！還種甚麼地，還想甚麼秋收？廿六七個縣，已經下種的至多二分之一，而且這二分之一的不苗，又多被砲火毀滅。比較沒有受到砲火波及的地方，是北寧路與中長路南段沿線的十幾個縣份，如錦縣、黑山、遼中、遼陽、興城、綏中等縣。可是這些縣份，經目本人的改良，幾乎大部是棉田。第一次棉蚜虫已經發生，當局因爲窮，沒有給棉農預備下殺虫的得利斯藥粉，四億通券棉貸，也只發了一億。棉蚜虫還要發生兩三次，棉苗將被腐蝕，今年的秋收無望，棉收也大有問題。談到飢餓，安東省最嚴重，在現階段之下，安東省算是偏僻的地方。過去產糧不多，何況戰後不停。岫岩、莊河一帶沿海的人民，早就以海草爲生。安東省政府幾次請求行轅救濟，一點點的錢，一點點的食糧，也斷續的由瀋安線運去。但是救不了好多人。記得去年十一月安東剛由國軍進駐的時候，安東市民就揹着空口袋，向市長包國華買糧食，市長嚇得不敢出門。從去年直到今年，安東飢荒問題根本沒有解決。六月上旬因爲戰略的關係，安東經國軍自動放棄，多少等待救濟的人民，被放在那塊極荒涼的土上。要想活命的人，不得不挺而走險，所以安東混亂的消息，傳過瀋陽。可憐的流亡主席高惜冰對人表示：「我將來怎麼回安東？把人民扔在安東，我退到瀋陽。」的確！接收的時候，大員如陰雲密集，共軍來了，大員又奉令一哄而散。高惜冰主席算是說了一句真心話。可是人民能原諒這些官員嗎？接收的時候來貼封條，共產黨來了，又以封條封了無數的箱子安然走掉。人民該不是傻子，是黑，是白，總會從此分清。

經過這次大戰，今年的秋收，似乎希望很小，所以飢餓在秋後，秋後纔是東北人民真正飢餓的日子。

拆拆丟丟　搬搬偷偷　搶搶毀毀　斷斷修修

東北的價值全在工業，所謂：「得到了滿州，就得到了中國」，這話並不錯，東北在歷史上，歷次

「學潮」平息了麼？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平津學生「六二」沒有遊行，六月五日又開始「休課」，此後雖曾一度罷課，却不再有遊行的消息了，於是平津各報一齊宣佈：「學潮平息了」。華北日報還透露華北學聯有解體的可能。平市工務局爲了整飭市容，發動員工清除學生們迭次書寫的標語宣言；某處牌樓上因有油墨印的「反內戰」等字眼，在「有礙觀瞻」的名義下，市政府不惜撥五百萬元的鉅款加以髹漆。某知名學者也發表言論，說是學生們幹的有如「一陣風起一陣風落」的一股潮。這一切，說明許多人有意無意的把這次的學運看作尋常的「學潮」；風息了，潮自然退去。

可是，「學潮」眞正平息了嗎？胡適校長肯定學運的背景是政治的腐敗，在政治沒有上軌道的今天，學生們會中途退卻在困難之前嗎？儲安平王芸生先生一再說明反內戰反飢餓是自然的趨勢，學生們也深切明白他們是在替四萬萬苦難的同胞作喉舌，在全國人民渴望着溫飽與和平的今天，他們會輕輕地卸下他們的担子嗎？外表上，六月比五月確乎平靜多了，街頭沒有遊行，學生們多埋頭在圖書館裏。但是，事實上呢？一個月來的發展，學運已進入了新的階段。

武大死難同學追悼會

表現於事實的第一是華北學聯的哀悼武大死難三烈士。武大慘案的眞實消息傳來北平，已經是六月十日左右。武大本是學風淳厚的學府，在學運中不是發動者，只是響應者，所遭遇的却竟是三個同學的慘死，這事件是多麼的慘痛！華北學生悲憤之餘，首先是絕食，繼之有六月十六日的罷課和追悼。十六日上午，烈日如火，民主廣場有一個盛大的追悼會，教授學生都參加了。許德珩，楊西孟，吳之椿，樊弘四教授還作了重要的講演，哀痛的音詞使大家知道今日的教授學生是緊緊地拉在一起，誠如一壁報所說：「倒下去的只有幾個，站起來的却是成千，成萬。」

理性與獸性的鬥爭

許先生是飽經風霜的「五四」健將，新近又看過南京「五二〇」慘案，所以一開口就是悲憤交集。「今天本來是上課的時間，同學們犧牲了功課來開會，我藉這機會來講演，爲的是慘重的問題，爲的是親愛的同學打死了。這是中國以前所沒有的事！『五四』運動把官僚的房子燒了，人也打了，才提去幾十個同學。『三一八』是倒段祺瑞，在示威的場合打死了一些人。現在進步得太快了！『一二一』在會場上打死了人，現在是睡在床上被打死了！這是最悲慟，最野蠻的事情。」繼之，他的話鋒轉到誰要打內戰與這次和運碰壁的經過。說到盡頭，他提起了胡適之先生「政府動了感情」這句話，「正面是動了感情，反面是沒有理性。……今天是理性與獸性的鬥爭，自由與暴力的鬥爭。」

要聯合在一個大原則下

吳之椿先生說：「『六二』以後，我見到學生一定要道歉，因爲我覺得我寫的文章都是些廢話。今天的感想還是如此。」在現階段裏，他認爲學生有領導政治的責任。怎麼樣負起這責任呢？「一、要聯合在一個大原則之下；二、要有堅強的組織，全國學聯必須組織起來；三、學生應該有喉舌，學聯要辦一個壁報。」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吳先生高呼着：「偉大的時代，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

樊楊二氏的話，對學運也是重要的指示。楊先生說明目前經濟的危機，由於戰爭的破壞與豪門資本

遭難，也就是這個原因。東北的工業基礎，是日本人替我們建立起來的。勝利後，蘇聯拆，共軍毀，暴民搶；政府接收的，又遭軍人偷，所餘的實在少而又少；幸而大部還能整理整理開工。恰巧遇不睜眼睛的內戰，在東北打得火熱，連國家民族都不要了，還講甚麼工業。打呀！打呀！打碎了鍋，大家睜眼餓着。吉林小豐滿電廠，是東北各廠的動力的泉源。這次大戰，小豐滿所有輸南滿各地的線路，全部入戰區，斷的斷，鋸的鋸，電力沒有了，撫順煤礦，本溪煤鐵公司，鞍山鋼鐵公司，大大的減產。甚麼全國煤鐵生產計劃，甚麼減少外匯，等到內戰平息再說吧！只小豐滿的輸電路修復，就得美金四百萬元，合法幣六百餘億。能修復嗎？不能修，難道叫東北工業全停擺？這要問爲甚麼打內戰。中紡公司東北分公司，在東北的規模相當大，紡紗廠，軋花廠，染整廠，人造纖維廠，分設在安東、遼中、錦西、遼陽、瓦房店等十餘處。這次大戰，像暴風雨一樣，把中紡公司洗劫一過，機器丟的丟，拆的拆，搬的搬，大部停工了。全部原料與財產的損失，約在流通券兩千億以上。政府的財力，還能使這些工廠復工嗎？那眞是奇蹟。東北的鐵路，那個不知道是四通八達，可是今天誰不知道是處處不通？政府接收後的鐵路，維持通車的有二千多公里，經過這次大戰的破壞，只剩了一千多公里。以瀋陽爲中心，東通一百廿華里的撫順，南通一百五十華里的本溪，西南通四百華里的營口，北通二百餘華里的昌圖。如果東北大戰最近能暫告段落，有些鐵路必須修通，如瀋陽到長春，瀋陽到安東，瀋陽往東經海龍到永吉。但是到那裏去找枕木？那裏去找路軌？那裏去買那毀了一百多輛的機車、還有兩千多輛貨車？過去每月運輸量七十一噸、已經夠可憐，以從這可憐的數字都維持不到了。沒有了運輸力量，談不到生產，沒有生產，別談建設，沒有建設，更休想復興。東北就這樣地在自殺的內戰中逐漸的被毀滅着！

（六月廿日於瀋陽）

的興風作浪所造成，而豪門資本家是唯恐天下沒有戰爭的，所以人民要活下去，必須打倒既得利益階級。樊先生則發表了他的一種新見解。他舉例說明支配人類行爲的，不是宗教倫理與科學，而是各人取得收益的方式；明乎此，而後能辨別友敵。在今天，被壓迫階級要聯合起來反抗壓迫階級。

一塊里程碑

無庸諱言的，這次學運初起時，教授學生兩代之間多少有些距離，現在呢？只有了解，團結與互助。教授們世故深，學生們鼓舞着他們向前走；學生們經驗少，教授們給他們指示出路。這是學運發展過程中的一塊里程碑，學運的陣容更加堅強了。

其次的表現，要算是慶祝全國學聯的成立了。全國學聯在上海籌備時，曾遭逢過許多迎頭的打擊，華北學生焦慮着它的流產，「抗議」「支援」的宣言一見再見。二十四日，全國學聯成立的捷報終於傳來了，像是漫漫的長夜之後見到了一綫曙光，教授學生一齊歡呼，沉靜了一些時的民主牆上又貼滿了紅綠綠的綱詩：「學聯，我們的旗，我們的星，你指向那裏，我們便走向那裏。」他們是如何重視這一個組織啊！二十九日下午，民主廣場上慶祝大會的熱烈，當然是意料中事了。

學聯與羣育

會中，主席報告了學聯成立的經過。「這是死者的血，鬥士的汗，千百萬人民的意志和希望凝結而成的。它的成立是全國團結的象徵，今後大家要擁護它，保衛它，支持它，加强它。」繼之，是新詩的朗誦。再次，便是樊弘教授的講演了。樊先生首先贊成胡適校長對學運的看法，從歷史的事實看，學聯的成立是天經地義的。進一步，他講到他的主題：「高等教育與學聯」。他指出：近數十年來中國教育的失敗在於忽略了羣育。羣育是教育的一大部門，學聯正是一種最好的羣育，有了學聯，便可以破除小我的自私觀念，培養皈依大我的服務精神；可以建立由下而上的民主組織，免除濫用權威的弊病，並能在互相的批評下改革，前進。可是，反對學聯的也大有人在。一說認爲學生宜埋頭唸書，書唸好了，再行干政不遲。又有人說：學生運動常常由一二人操縱，把持，非眞正的民主。這兩點，樊先生承認都有片面的道理，但也都犯了錯誤。如果學生只盲目的唸書，與現實脫節，將來出學校後，還不是替人家做工具，讀得好固然可以做番事業，但大多數還不是一些幫兇，這是一個大危險。至於怕學聯由少數人操縱，就根本不要學聯，毋乃因噎廢食；須知此種弊病的發生乃由於過去的學生活動太少的緣故，補救之道在於加强以後的活動。樊先生也提到了合法不合法的問題，他用詼諧的語調說：「法有大法小法之分，憲法中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學聯是合乎大法的。」綜上所述，他肯定地下結論：「學聯是天經地義的合理，反對學聯的教育者便是八股教育家，反科學，反時代的教育家！」

中山先生鼓勵組織學聯

清華的張奚若教授本來要來講演的，因臨時有事沒有來。許德珩教授害了病，一封懇切的信替代了他的講演詞。在許先生的心目中，這一個時代與北洋軍閥時代一模一樣。那時，軍閥們用日帝國主義者的槍彈屠殺人民，學生們反對；現在，美帝國主義者又以一億三千萬發的子彈來屠殺中國的人民，學生們也應該反對。那時，軍閥們禁止組織學聯，只有孫先生百端鼓勵，一講演就是三點鐘；現在又有人說學聯不合法了。學聯並非新花樣，有什麼不合法呢？學生們不是有公民資格，有集會結社的自由嗎？情勢的嚴重，許先生叫同學們團結，努力！

響應着這一個呼聲，學生們高呼着：「擁護學聯」！「保衛學聯」！「加强學聯」！「支持學聯」！「學聯萬歲」！「民主新中國萬歲」！

八時許，會散了，一個年青的朋友，而着飄蕩的民主旗，拍着記者的肩膀說：「瞧！明天已經不遠了。可是，我們的担子也不輕哩！」

我們再能說這次學運是一股潮嗎？這股潮已經平息了嗎？

（七月二日深夜）

（上接第二頁）內心是痛苦可憐的革命軍人，將來一定會在自由主義者小市民，農工，在智識分子鼓勵與組織之下，攜起手來共同改造社會的。軍人中間容或有先入爲主的看法，盲目的服從去幹那殺自己人的違心的勾當。但是事後他們一定要懺悔，即所謂「內疚實深」。

我爲了一家，所以仍戀戀于這個人家羨慕的階級。我沒有退役，也沒有絲毫表示。但如果到一定要我到前方去參加「內戰」的話，那我便要有所表示了，或自殺以喚醒同胞，或改行以表示消極：：話太嚕囌了，就此打住。總之，我向編者讀者表示：「中國軍人本來前進」，除了少數已經升官發財成了屠戶之外。

張××　七月一日　于姑蘇旅次

紐約來鴻

編者先生：最近收到國內的報紙及貴刊，讀後令人氣憤。內戰使人人不能安生，學生們的喊聲，正是全國人民心裏的聲音。想不到當政者竟公開的施以暴行。在這兒，環境雖然安定了，生活雖較舒適，但想起國內受着千辛萬苦而又不能安心讀書的同學，不禁慚愧萬分。

在這封信上，我願意報告一點，即是國內學生們的行動及當政者對付學生的手段，在美國已引起廣泛的注意。據說五億元大借款遲遲不能成功，馬帥不滿意政府在此次學潮中所採用的處理方法也是原因之一。

同學們！你們的苦不是白吃的！光明即將來到。你們在國內奮鬥，我在此作一個宣傳的小卒，我們大家繼續努力，來改造我們的國家。

田心源　六月二十二日　紐約

（下接二十三頁）

週末閒欄

論風度

張嘯虎

本年一月，觀察社徵聘編輯，我因嚮往已久，冒昧應徵，並請自降為助理編輯。旋接主編儲先生來信，認為我錄取無望，要我放棄應徵。我雖然惆悵，但知道徵求水準甚高，也祇好知難而退。其後又收到儲先生來信：「讀五日來書，實在很高興；因為這封信很有風度。凡是我們的希望沒有達到，而仍表示很大方的態度，這就是一種風度，而這風度正是現今一般人所缺少的。」讀後深受感動。這給我是一個鼓勵，也是一個警惕。我開始思索和研求風度各方面的意義，時日積累，稍有心得，謹臚述之。

「風度」一詞的意義，簡言之，即一個人的作風與態度。首言作風，主要點在一「風」字。中國人最喜以風字形容各種較為抽象的事物，往往造成一種不可名狀而耐人尋味的想象與境界。如「風氣」「風化」「風俗」「風頭」「風水」「風騷」「風韻」「風潮」等，其意義難以捉摸，而所代表的氛圍或典型則果然存在。又如稱人的碩德重望，則謂：「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嚴子陵祠堂記）；稱人的儀表不俗，則謂：「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晉書裴楷傳）；稱人的威嚴勇武，則謂：「快哉此風，此大王之雄風也」（宋玉對楚王問）；稱人的器識超羣，則謂：「標榜風流，遠朋管樂」（三國名臣序贊）；稱人的清高淡泊，則謂：「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世說新語）；用此一字，便將其事其人，躍然紙上，使人倍生親切溫暖之感。其他如：教育有方為：「如坐春風」；將軍武猛為：「望風披靡」；志節高超為：「風骨魁奇」；教化遠播為：「流風餘韻」；識見遠大為：「風鑒明遠」；志託夷遠為：「風趣高奇」；等等，以同一「風」字，加於各種不同的字面上，便立刻反映各種不同的型式和印象。似乎其本身具有一種崇高神明的力量，感人深而且切。上述各例，亦即各自代表一種作風，或說同一種作風所產生的影響。先賢中最喜用而善用此一「風」字者尤推孟子。如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由此可知「風」之一字，的確足以顯示出一種型式，一種境界，一種力量，和一種影響；而此種型式，境界，力量，影響，源遠流長，久經歷鍊，合而為一，融然無間，遂完成一種獨特作風。再言態度，則包含有外表的與內心的兩方面。就外表說，是一種處世待人的姿態。有「少年英俊」，有「雄姿煥發」，有「儼然仁者」，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陳先甫語），有「道貌岸然」等。同時，也有「醜態」，有「兒女態」，有「老氣橫秋」，有「脅肩諂笑」，有「媚態」，有「忸怩作態」等。一個姿態，往往就代表一份人格；一個表情，往往就說明一份品性。就內心說：一方面是一種權衡事物與估計價值的尺度。諸葛亮所謂：「吾心如秤，不能為人所輕重。」道德指歸論上所謂：「我身者彼身之尺寸也，我家者彼家之權衡也。」是很恰當的解釋。因為有這種正確的尺度，然後才能處以適當的態度。另一方面就是一種兼容並包的大度。易曰：「君子以容民畜眾」，書曰：「有容德乃大」，詩曰：「寬兮綽兮」，往古聖賢，莫不力行寬容；蓋有寬容然後有雅量，有雅量然後有大度，而大度正是風度的條件之一。風度二字的意義，都包含在上述各點中。

因為各人的出身，遺傳，環境，教育，意志，習慣，理想等等不同，故其所表現的風度也互異。換言之，即各有其做人做事的作風，各有其對人對事的態度，不能強其相同，也不必強其相同。在合乎道德信條與社會習慣的範圍內，其不同，「各有千秋」，無可軒輊，且毋寧說這正是風度的可貴。故風度可以分成幾種典型。就生理的觀點言，如 Hippocrates 氏將人性分為四類，因而其風度也有四類。第一為多血格（Sanguine type），其風度的優點為活潑樂觀，缺點為輕薄浮誇。第二為黏液格（Phlegmatic type），其風度的優點為恬靜沉着，缺點為遲鈍萎靡。第三為膽汁格（Choleric type），其風度的優點為勇敢果斷，缺點為剛愎暴燥。第四為黑膽格（Melancholic type），其風度的優點為深沉淡泊，缺點為怯懦悲觀。這雖然過於重視生理作用的結果，但生理作用確是形成風度典型的基本因素。就道德的觀點言，「孔子家語」中將人格分為五類，而其風度也有五類。如：見小闇大，不知所務者謂之庸人；心有所定，計有所就者謂之士人；篤行信道，自強不息者謂之君子；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者謂之賢人；明並日月，化若天神者謂之聖人。這種分類過於抽象而狹窄，不足以概括風度的典型。惟 Eduard Spranger 氏的分類，則很可以作為本文論述的依據。氏分人為六類，茲依其類別而敘述風度典型的我見如下：其一為哲理之人（Theoretical man）。此種人的風度是致慮守靜，默而識之。在心靈的修養上，如老子所謂：「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如孔子所謂：「空空如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故其風度是：「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泰而不驕；和而不同，羣而不黨；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在其平凡的表情上，常有一個「學問的微笑」，如意大利作家 Eurico Castelnuor 氏在其小說「失落的信」裏所描寫的那位教授：「平時他的嘴唇上，祇有那種學問上的微笑，那是有學問的人聽到同僚或世人的謬論而露出來的勝利和憐憫的微笑」。其二為宗教之人（Religeous man）。林同濟先生曾釋宗教的核心意義，以為是「自我」對「無窮」的一種體驗和表示。自我是起點，無窮是終點；在無窮偉大相形之下，自我何曾眞實！幻夢覺醒，驀然孑立，必生一種愛慕與嚮往，於是謳歌之，膜拜之，奔赴

皈依之，此最後的妙境，耶敎爲上契，佛敎爲眞茹。故其風度的表現爲空明圓淨，如王荊公詩：「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空夢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如楞嚴經偈：「如世巧幻師，幻作諸男女；雖見諸機動，要以一機抽；息機歸寂然，諸幻成無性；六根亦如是，元依一精明；塵垢念應消，成圓明淨妙。」爲慈悲博愛，如新約中所說：「要存着愛心，愛心就是連絡全德的」；馬太福音中所說：「要愛你的仇敵，不要和惡人作對，有求你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等，均爲宗敎人的表現。其三爲權力之人（man of power）。此種人的風度，在往古爲英雄主義。牛津字典上釋 Hero 字爲：「具有超人之能力爲神明所默佑者；聲名煊赫的戰士爲國家出力者；有成就並有高貴性格而爲世人所崇仰者；詩與戲劇中之主角」。從古雅典時代的羣衆領袖到現代集權國家的獨裁統治者，政治人均有這種傾向。劉劭「人物志」中有謂：「夫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從這種解釋中，就可見英雄風度的一般了。在近代則爲政治家。如美國第三任總統哲斐遜即爲最標準典型，其生平從政的風度，均足爲後世楷模。氏歿於一八二六年，自撰其墓誌銘曰：「美國獨立宣言之撰作者，維金尼亞省宗敎自由條例的起草者，維金尼亞大學的創辦者，哲斐遜長眠於此」。從這裏就可看到他底令人嚮往崇敬的風度了。其四爲經濟之人（Economic man）。Scott 在「撒克遜規後英雄傳」中描寫那位 Cedric The Saxon 說：「從這個財主的容貌上看來，他是一個坦然急迫而大膽的性情；其體高過中材，但肩寬臂長，強而有力，似乎是一位久經艱難，善於耐苦者；而他一切的表現是在急迫之中，帶有剛愎的神氣。」我們不能以「市儈氣」「銅臭」去看經濟之人，Smith 以爲人類舉動之是否合倫理，在一種主觀的心理表示——同情與否，而其價値，則視其客觀的結果。故一個經濟人之是否有風度，即視其是否有這種主觀的表示和客觀的結果。其五爲社會之人（Social man）。人類羣性的表現有三，即好羣（Gregariousmen）同情（Sympathy）愛情（love）是也；社會之人即辨此三者發輝至高度的境界。Spranger 謂社會爲「個人活動於時間與空間中而爲有生命的集團」。社會人在這種集團裏，當有中正和平的風度。朱熹謂：「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禮記樂記篇謂：「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中庸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有這種中正和平的風度，始足以完成社會的和諧，達到人與人之間的親愛精誠。其六爲藝術之人（Aesthetic man）。在岡察洛夫底小說「懸崖」中，有一位人物說：「藝術家，是一個向你借錢，說些毫無意義的話，讓你發狂的人；藝術家的生活，在這世界上就像天上的鳥一樣。我在聖彼得堡已經看夠了，那些大膽的無賴們，穿上離奇古怪的衣服，在晚上聚會，躺在睡椅上，抽着煙斗，談論些瑣碎的事，唸詩，喝白蘭地酒，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這完全是一種鄙俗無聊的看法。藝術人是讚美人生的，熱愛人類的，是無情地暴露黑暗和醜惡的，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在其智慧的宇宙裏，另有一個自由廣大的國土。所以他的太息，他的眼淚，他的悲惆，他的詛咒，他底狂笑痛哭，甚至他的乖僻，他的瘋狂，莫不是天才的發揮與神奇的象徵，而其風度的表現也不能以世俗的眼光去看的。我最愛讀「此身合似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認爲最足表現「亙古男兒一放翁」底瀟灑豪放，淡泊高遠底詩人的風度了。以上所述六種典型，包括所有各種不同的風度，而風度的修養和估價，也將以此爲標準。

一種風度的形成，包含有四個主要因素。第一是品格。品格亦稱人格（personality），通常含有倫理與道德之意，在心理學中，即就人之爲人而言。Allport 謂品格的成份有：內體（physique），智慧（Intelligence），活力（motility），氣質（Temperament），動機（motivation）等；而 Lewy 則以人格一詞是 All-in clusive——has, is, or con, do, feel, think, or wish，凡此均係品格所包含之屬性，這些屬性，基本地造成了風度，也直接地影響着風度，可說是造成風度的原動力。第二是敎育。Lange of Copenhage 謂：「敎育之目的，恆在其教誨個人，使其節制，降服，滅絕其衝動之直接來自身體構造而不適宜於其社會關係者。以生物學的觀點言之，可謂敎育之目的，在壓伏單純而原始的反射活動，而以高級的活動代替之。是故，自吾人之嬰孩時期以來，吾人即接受訓練以節制反射情緒之不見許於文明社會中者」（見「情緒論」）。我覺得風度就是一種適宜於社會關係的高級活動；換言之，即是正義、人格、意志、節操、胸襟、理想、抱負等精神價値的鍛鍊，其結果就是一種高尚的風度，故風度也可稱爲行爲的美化。此種美化就正是敎育的功績。第三是道德意識。據 J. Dewey, W. K. Wright 諸氏的意見，人類道德的形式分爲三種。一曰本能道德(The instinctive morality)，如父母愛護子女之行爲，合羣之行爲，來自本能，而合於道德。二曰習俗道德(The customary morality)，因羣衆生活所形成之習慣，支配人類行爲，遂公認爲是一種美德。三曰反省道德(reflection morality)，人類智識發達，自覺程度提高，其行爲均經自由意志的自我判斷，始見諸實行，民主社會中，尤應提倡此種道德。此三種形式的道德，不但是修養風度的出發點和歸宿點，而且是風度底存在和發展的範疇。第四是時代風尙。L. A. Ross 謂：「所謂風尙者，乃對於同一時代人士發爲有意的，非競爭的，非理性的模倣作用也」。如魏晉六朝的時代風尙是：「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庾信：哀江南賦），「[illegible]

[illegible]

論悲劇人生觀

陳渡竹

悲劇的人生觀，不是消極的否定的聽天由命的人生觀，而是積極的肯定的奮發有爲的人生觀。

悲劇是人類抱着高超偉大的理想，本着嚴肅認眞的精神，去向處於敵對地位的命運環境，甚至自我，實行奮鬥的結果。假如我們隨遇而安，見風轉舵，我們便不會發現各種處於敵對地位的障礙，即使發現，亦不會從事奮鬥，更不會產生悲劇。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謂悲劇係一種莊重嚴肅首尾完整的動作之表現。何謂莊重嚴肅的動作？近代英國批評家劉開士（F. L. Lucas)在『悲劇論中』釋爲『關係重大的事』（that matters），『値得費勁的事』，(that is worth troubling about），極有見地。所謂關係重大，値得費勁，都是嚴肅精神的表現。在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知其不可爲而不爲的人看來，天下有何不了之事，甚麽事情都無關係，甚麽事情都不値得費勁。

人生不過百年，而不如意事常八九，縱能隨心所欲，到頭來總難免一死。人生價値何在，意義何在？假如我們單就命運之無常，生死之不測着眼，自然難免流於悲觀厭世，甚至玩世。古詩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魏樂府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德國悲觀主義哲學家叔本華，詛咒人生不遺餘力，認爲生存慾的絕滅，便是人類的解脫。他並且說：『假如有人去敲墳墓之門，問死人願否再活，他們一定搖頭。』這樣說來，我們何苦過事認眞，從事奮鬥，以自尋煩惱呢？

我們對於此種悲觀論調，無需在此多費筆墨，因爲人生自古皆有死，莫不欲恨而吞聲。但是，我們的問題不在這裏，且將神秘莫測的死亡丟在一邊，應該先就現實生活着眼。雖然希臘大悲劇家索福克勒斯在『窩狄浦斯王』中，借歌隊的嘴說，人最好是不生出來，但是我們既已生在人世，就不必再說生出來是好不好，應該研究如何生活下去才是最好。上天有好生之德，正如叔本華所說，人爲生存慾所驅使，非得生活下去不可。人生雖短，亦有幾十年工夫須得打發。我們必須承認人生確有意義，確有價値；然後纔不至於空過這一輩子。我們有此信念，於是才有勇氣從事奮鬥，企圖征服一切困難。古今偉大悲劇人物，無不抱定此種信念。如照莎士比亞在『馬克白』中所說，『人生是傻子講的故事，雖則慷慨激昂，卻是毫無意義』，則每個人都棄生命如敝屣，悲劇從何產生？所以，肯定人生之意義與價値，爲悲劇人生觀的第一個特徵。

我們既然相信人生有意義有價値，則我們必然相信人類具有自由意志。人類是否具有自由意志是一同事，我們相信人類具有自由意志又是一同事。人類必須有所作爲，而且相信自己確能有所作爲，然後人生才有意義有價値可言。悲劇人物對於一切事情，都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不畏艱難，不計成敗，認清目標，奮鬥到底。假如我們自認不過是個傀儡，隨處任憑擺佈，像莎士比亞在『李爾王』中所說，『神祇作弄我們，猶如頑皮小孩作弄飛虫，他們僅爲貪圖一時之快，竟將我們處死。』假如這樣，我們一定心如槁木，萬念俱灰，毫無生趣，毫無鬥志，出師未捷身先死，怎樣能夠有所作爲？故相信人類具有自由意志，爲悲劇人生觀的第二個特徵。

我們有此兩種信念，然後才有大無畏的精神，去向各種敵對勢力奮鬥。人世確有各種惡勢力，隨時在欺侮我們，壓迫我們，無論其爲命運環境遺傳社會制度甚至心理作用，都是一樣。我們必須征服這些困難，人生理想方可實現。誰不追求美滿幸福的生活？誰不懷抱高超偉大的理想？我們希望自己活得好，同時亦願意人家活得好；因爲個體的幸福，惟有從集體的幸福中才找得到。然人力終屬有限，各種黑暗勢力卻是無限，以有限求無限，失敗乃意中之事。我們並不因失敗而退縮，寧可被黑暗勢力打得鮮血淋漓躺在地上，決不舉手投降；這種精神，充分表現出人類的悲壯美與雄偉性。悲劇人物到頭儘管失敗，實在雖敗猶榮，令人肅然起敬。我們看完悲劇之後，不僅覺得各種黑暗勢力之可怕，更覺劇中人物之可敬，人生之値得留戀，理想之値得追求。偉大的悲劇，足以增加我們的生命力，提高我們的生存慾；否則，人生已夠苦惱，我們何以愛看比人生更苦惱的悲劇。因此，懷抱高超理想，努力奮鬥到底，這是悲劇人生觀的第三個特徵。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眞是一個最苦惱的時代。左右爲難，進退不得，觸目傷心，毫無是處。我們現在幾乎衣不暖食不飽，生命危在旦夕，怎能不流於悲觀，甚至厭世玩世？凡有理想有作爲的人，幾乎動輒得咎，尚未向前邁進，早被封鎖包圍，無從舉步。在此令人窒息的空氣中，大家只好放棄理想，隨便鬼混下去。哀莫大於心死，世上最沒有比毫無目的毫無理想的人生更可鄙可痛的事。難道中華民族眞要沉淪於永刼不復的深淵嗎？難道在這大船將要沉沒之時，竟沒有乘客設法搶救嗎？

但從另一方面看，我們這個時代，卻是一個最悲壯的時代。這個時代所產生的各種苦惱災難，最適宜於悲劇的發育；悲劇藝術在苦難中成長，在苦難中開放奇葩。我們不應該像現在這樣鬼混下去，等待下去；我們好容易才有這幾十年的生命，必須很嚴肅的很勇敢的活下去，有理想有作爲，直到最後一天，將生命冊交給上帝時，可以很驕傲的說：『我並沒有白活這一輩子。』人生如夢，但是我們要很認眞的去做；人生如戲，我們要很嚴肅的去演。

投稿注意

過去讀者投稿，無論附郵與否，凡不採用者，本刊立刻退還。最近郵資加價，本社經費拮据，不得不極力撙節，用特重申前議，以後讀者投稿，如不採用，須退還者，務請附寄貼足回件郵資之信封一個，以便郵璧，否則即隨手撕去，以免堆積，事後查詢，恕難奉復。

觀察文摘

爲中國問題忠告

美國

原作者：張東蓀

原刊處：時代批評復刊第一期

中國問題，應該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美國却把中國問題認爲是它的問題了。美國既認爲中國問題是美國的問題，便想依照它自己所定的方式與它自身利害的打算來求解决。遂不把中國人自身的要求列入第一位，甚且忽視了中國人自己所希望的眞正出路。不過美國所希望於中國的，如果與中國自己所企求的大體上差不多，則中國人决不會反對美國的參與中國問題。無如現在美國的對於中國問題的解决方策實在與中國任何有思想有眞心的進步人士所企求的大相逕庭。這使逼得我們不得不向美國一進忠告。

美國應該了解這次大戰後有許多國家，其內部都有解放的要求。這不僅中國爲然。這些國家所以被法西斯主義國家所侵略之故不僅由於地理上的關係，實亦含有其他原因。這些國家大概都是多年積弱，或由於連年內戰；或由於政府太腐敗；或由於長期專制。這些國家的人民大概又都是在重重壓迫之下。所以大戰勝利以後，這些國家的人民都抱有二重希望。第一當然是恢復祖國；第二却是借此機會以改眞政治。這兩個希望雖好像是兩個各不相連，然而却無法分開。亦可以說眞是一個希望。戰後的英美對於這一點都是走入相反的方面。一方面固然盡力幫助這些國家使其脫却了侵略，但他方面却又竭力扶植這些國家原有的統治階級，遂致這些國家的政治在戰後反比戰前加倍黑暗。在我們看來，英美所取的這個政策可謂十二分不智。須知這些國家的人民只是反對他們自己的統治階級，對於英美與蘇聯本沒有好惡與親疏。英美，尤其是美國，一味援助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加强其壓制本國人民，則這些人民自然會恨及英美。又因爲這些國家的人民要起來革命，便不能不採取一種作革命理論的指導。於是乃不約而同相率趨於左傾了由這種左傾不是自願，乃實由於被逼。假如英美不是這樣的短視，在最初就偏向於這些國家的人民一方面，我敢說這些國家中很少自己願意走甘心作蘇聯的衛星的地位。英美應該知道一個國家要想改革其自身的政治，乃是一個最强硬而不可抗的要求。雖則其中可以經過無法的磨折與比較長期的迂迴，而終久是壓不下去的。所以英美這種作風只是徒然製造許多糾紛，而並沒有解决眞正的問題。好像英國在若干方面已漸有一些覺悟。所不幸的是：美國不但不覺悟，反而變本加厲起來了。總之，美國以爲這些國家的不安是由於左派作祟，又有蘇聯在背後煽動，還完全是倒因爲果。我敢說，倘使這些國家的人民的對於改革政治的强烈要求不被美國從外邊阻止，甚或反予以方便，則這些國家中至少有好些個可以由偏左而變爲英美式民主。

以上是汎論，但我現在却不完全拿這個汎論上的原則用於中國，我們單獨來說中國。

美國對於中國似乎共只有可能的三條路。第一條路當然是馬歇爾初到中國來的時候所定的那個莫斯科三次外長的共同聲明。內包含三點：一是立卽停止內戰，二是組織聯合政府，三是不干涉中國內政。這些雖到了今天仍依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但美國當局似乎早已不記在心上。於是我們便要提到第二條路。這一條路是美國正在走着的。我們相信美國對於這一路條實在沒有信心，所以還可能有第三條路。容我先把第三條說出來。

美國爲了對蘇，在不惜一戰之前，必須造成包圍的牆壁，則對於中國因地勢關係，當然不會放手。既不放手便須進一步把中國造成一個反蘇基地。根據這個目的，美國可能更在軍事與財政兩方面大量援助中國現政權。其方法或則在軍事方面不僅代爲配置與裝備，並且還要擔任訓練與指導。大量的軍事顧問要源源而來。財政方面或則是五億元借款以後，再繼續以十億元，更繼以二十億元，都說不定。因爲非大量資助無限貸予是不足以把中國的急流向下的經濟挽回轉來，使歸於穩定。如其這樣做，我預料美國對於中國現當局的腐敗無用必不放心。所以必須由美國自己派人來參與其間。除了軍事方面以外，財政方面亦會有人來。且不僅此，更必須有個大員以總其成。這個人用甚麼名義並沒有關係。曾經有一度有過麥克阿瑟使華的呼聲，這便在暗中象徵這個第三條路綫。

在我們看來，這個可能的第三條路仍是不通的：第一，國民黨對於美國的援助雖是歡迎之不暇，但對於美國要來事事干預却必感覺大大不便。所以卽就國民黨方面來說，亦必是反對的。第二，這樣源源不絕的大量支持與幫助在美國的腰包是不是會有問題？美國人是不是感到負擔太重責任過大？同時又感到得不償失，在美國內部是不是會引起極大的反對？因此我敢斷定美國既有這些顧忌，所以對於第三條路迄今還不敢有所打算。第三，對於中國的事這樣越俎代庖，太傷中國主權，必定因此盡驅中國知識階級全數變爲反美者。這一層美國亦不能不有顧慮。

至少我們可以說在目前美國還沒有膽量與氣魄以毅然决然去走向這樣的第三條路。不得已於是便變爲現在所正在走着的第二條路，其實這一條路亦是絕對不能成立的。這第二條路就是馬歇爾離華聲明書上所建議的那個方案在現政府中加入了一些所謂自由份子；至於共產黨則愛來不來。美國對於這樣的中國政府在可能範圍內作有限的或非大量的援助。但據我們分析，這個辦法必是完全無效：第一，因爲內戰不停止，一切建設無從着手，財政更趨絕境。第二，政府的性質未起根本變化，貪污不能絲毫剷除，效能亦不見絲毫提高。依然只是一個現狀的維持。可以說僅僅是拖長而已；根本上絲毫沒有解决問題。

因爲問題的中心還在於國共戰爭。老實說，對於共產黨的戰爭，其解决除上述的拖延以外，只有兩法：一個是講和；另一個是澈底的打與有效的打，把共產黨打完。要取第二法，中國國民黨自己的能力不足任之。美國如願來幫助，那就得走上述第三條路。我們知道美國今天還沒有氣魄毅然出此。同時美國又必須了解這樣的第二條路是完全白廢。可見美國對於中國問題的傷腦筋恐怕不在我們中國以下。

其實美國對於中國問題的苦惱都是美國自己找的。美國應該明白：這樣一個亂糟糟的中國，十年亦整理不清，硬要拉來

作反蘇基地，有什麼用處？於是我們願意向美國一進忠告。我們這個忠告不是對於美國在野的進步人士而發的，因為他們不但明白美國拿中國來作反蘇基地是勞而無功，並且反對美國這樣整個兒的冒險政策。我們乃是向美國當局說話，希望他們把腦筋清醒一下，用理智來再考慮對於中國問題的態度。

我們先說中國的願望。美國反蘇與否，中國不想管，亦不應該管。美國如果堅絕對蘇取強硬政策，那是美國自己的事。只須與中國沒有關係，中國並不希望美國有所改變。這是一個前提，希望美國當局能認識清楚。千萬不可以為中國人民現在反對美國的片面援助國民黨是在暗中替蘇聯幫忙，其結果是與蘇聯有利。如果作這樣想法，那就是腦筋太不清楚了。中國今天只能自己管自己的事，自己救自己。中國為了自己計，不能把國家長久陷於混亂中，應該迅速停止內戰，這是最邏輯的。無論任何人不能反對，亦不能加以猜疑。無論那一國苟對於中國作戰的任何一方有所援助，便是使中國內戰延長與擴大。中國人民全數是反戰的，當然對於助長戰爭的不能不憤恨。中國本來不會親蘇，甚至於要可說，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中間階級是對蘇聯有惡感的，但萬一不幸，將來不能不偏向於蘇聯的那一天，那是美國逼迫出來的。這卻必須由美國負完全責任。

中國人的願望是很簡單的：即請美國不要把中國列為反蘇基地之一。美國要建立反蘇基地，請向他處去建立。務必把中國除外。中國並不管美蘇間的關係如何：戰爭也好；講和也好。我想中國人這個願望，美國當局不是不能考慮。他們只要對中國情形詳細考察一下，便當知道把中國建為反蘇基地，必是（一）所費太大；（二）麻煩太多；（三）最後未必成功。詳言之，主要的困難還是在於有中國共產黨。美國決不能自己動手來消滅它；借手於國民黨又無效率，等於自殺軍火。長期戰亂對於建立反蘇基地只有害而無益。這便是上文所說的第三條路之所以走不通的緣故了。

至於現狀，即上文所說的第二條路，則離反蘇基地的企圖更遠。可以說只是把混亂加以深刻化，其結果不但不能變成反蘇基地，乃並把美國在遠東的一個市場亦弄得破碎不堪，不足供美國銷售物品之用了。這個辦法不僅是把反蘇基地的企圖使其無法建立，並且把中國當作商場的企圖亦同時歸於無效。美國當局必須速恢復冷靜頭腦與虛冲胸懷以接受各方的批評。

我們替美國想一想，除了甘心對於中國完全放手以外，對於上述的三條路，第二與第三都是行不通的，所以美國當局若能恢復其理智，若能有真心與炯眼，則仍然應該回轉到第一條老路上去：第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外長聲明並沒有正式取消；第二，杜魯門總統後來亦還提及；第三，蘇與英亦必肯眼看美國的不算數而不有所表示。因此我們以為儘管美國目前所走的不是第一條路，但卻仍有回到第一條的可能性。因為在形式上沒有正式作廢；而在利害上還是這一條路有一些利益。雖不能把中國作成反蘇基地，然至少卻可使中國成為一個很好的市場。中國能恢復和平還是與美國有利的。中國長期混亂則與美國究竟有害，中國如照政協的方式而得和平，則決不會變為親蘇，美國在這一點上不應該有甚麼不放心。希望美國當局放出睿智來，澈底權衡一下此中得失，而毅然放棄以中國為反蘇基地的野心，則中美兩國便都得着益處了。其方法亦甚簡單：就是在下次有機會外長會議時由美國提議再發一個共同聲明，內容是說美國對於中國內戰將再從事調解。便顯示美國的再調解又得英蘇的同意。但必須從現在起即停止對於國民黨的任何援助。我們相信到那時國民黨必會接受，共產黨，因為是在一個新的基礎上談和，亦必會接受。這乃是美國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合理辦法。

（上接第十八頁）

如何實現「草根民主」？

編輯先生：貴刊二卷十二期讀者投書中有簡貫三先生提出「草根民主」，謂初步辦法，應減輕農民負担，以改善農民生活。此種提議，能為大多數人民着想，其用意當是很好的。不過在戰亂沒有停止之先，事實上又有什麼方法減輕農民的負担呢？強壯的農民都被抽去當了砲灰，餘下的都是些老弱婦孺，他們的生產能力微弱，田地荒廢，沒有飯吃時，只好向富農（小地主）去求借，然而高利貸却扼住了他們的咽喉，在春夏借了富農一担穀，到了秋收之後，連本帶利折合起來，就要四五担穀子才能還清。老弱的貧農，怎能担當得起這種高利貸呢？不到一年，他們所有的財產都被富農折算過去，再也沒有人願貸給他們任何東西了。他們便只有撐着幾根如柴的骨頭，扶老攜幼去向富人乞食。但是富人家的門關得緊緊的，還有惡狗不斷的兇猛地撲向他們，結果，這些善良的人羣，終究是要在路旁倒下，結束了慘的人生。老實說，目前大多數的農民，他們不僅需要消極的減輕負担，而且需要積極的救助，對這件事情，在萬惡的內戰沒有停止之先，請問有誰能拿得出有效的辦法？

謝斐然　六月廿六日　溆浦

恢復人性·重視人權

編者先生：貴刊二卷十六期周綬章先生「瘋狂了的中國」一文，讀後不勝感觸。周先生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世界各國多已走上復員、復興、新生、進步的道路，惟有中國正瘋狂地進行着毀滅性的內戰。為了要避免不幸的後果，爭取和平，挽回這一個盲動的、悲劇的大時代，周先生希望大家「回到理性」！一切訴諸理性！大家皈依理性！我除了對周先生的意見表示擁護外；我還要提出「恢復人性，重視人權」的口號來加以補充。今天中國的好戰份子，不僅沒有理性，連人類的基本意識——人性，都沒有具備。在沒有恢復人性之先，是無從同到理性的。他們好戰，他們瘋狂，他們把中國四萬五千萬的人民都當作肉靶子，作為他們廝殺的對象。在他們的意識中，人已經不再是人，而是僅僅具有一副肢體的動物了！

西洋文藝復興時期，在思想上要求自由，在個人方面要求人的權利，在學術方面倡導科學，所以文藝復興時期，又稱做理性時代(Age of Reason)。其後又有盧梭的人生而自由(Man is born free)的理論，但是這些理論還在十七、十八世紀以前就被提出過了，為什麼我們現在還沒有接近它的邊沿？而且更相反地走回更黑暗的境地？所以我們今天不得不再度提出「恢復人性，重視人權」。

現在眞的是欲言無語，欲哭無淚的時代，我們痛心理性的消沉，更痛心人性的滅絕！這個時代不知伊於胡底！

楊育才　六月廿日　昆明

暑假返里以前
請訂本刊一份

晨光出版公司

ZUNG KWANG PUBLISHING CO., LTD.

4th Floor 215 Szechwan Rd. (Central)
Shanghai, China.
Tel. 13545 13546 Cable Address
Zunkwanco

上海四川中路二一五號大廈四樓
電話：一三五四五　一三五四六

遷移新址　開始預約　兩大巨著

蕭乾編選

英國版畫集

八色版六幅　單色版一百幅

二百餘頁　副道林印

硬面一大冊　七月底出書

蕭乾為國內著名文學家兼名記者，第二次大戰期間，適在英國講學，因對版畫藝術素有興趣，所以當時搜集了不少英國的版畫，去年回國後將其平日所收集的英國版畫，精選一部，另向英國著名版畫作家徵求了一部，編成本書，內有木刻，銅刻，石刻，等大小一百餘幅，部照英國第一流版畫家之代表作品，內用八色版彩印者六幅，銅鋅版單色印者約一百幅，全書用銅版紙及副道林紙單面印・每幅附中英文說明，前有長序，介紹英國版畫發展之歷史，後附作家傳略，計厚二百餘頁，燙銀硬面精製，二十開大本一厚冊。本書現已付印；約七月底出書，凡愛好藝術文學之讀者，請立郵預定。預約價國幣八萬元，外埠普通郵寄加一，航寄加二，多還少補。出版後售價至少在十萬元以上。

陀斯妥也夫斯基作　耿濟之遺譯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一百二十萬字　一千四百餘頁

三十二開　四大厚冊

彩色封面　附有插圖

俄國文學翻譯的權威者耿濟之先生於抗戰期間，蟄居上海，閉戶不出，專門翻譯本書，依俄文本全譯，經二年而完成。耿氏最近在滬逝世前，曾將本書譯稿全部交本公司出版，現已分部印制中，共一百二十餘萬字，一千四百餘頁，分訂四厚冊，另附插圖，彩色封面，合成一套，名貴非常。本書現先行發售預約，每套四冊，售國幣八萬元，外埠普通郵寄先收一成，航寄先收二成，將來多還少補，出版後實售價每部至少在十萬元以上，凡愛好讀耿譯俄國文學者，請速預約。出版期，本年七月底。

預約八萬元（外埠郵費另加）　印有樣張・函索即寄　**預約八萬元**（外埠郵費另加）

師陀創作

結婚

定價十六元　最新出版

以淪陷時期的上海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曾連續刊載於文匯報，極得讀者好評。

端木蕻良作

大江

定價十八元　最新出版

抗戰期間曾轟動香港桂林重慶的一部長篇名著，寫抗戰時兩個英勇戰士的故事，附張光宇作插圖。

王西彥作

村野戀人

定價十八元。最新出版。寫湘桂戰爭時期湖南一小村中兩對兄妹的戀愛故事，表現農民的堅韌和執着性。

改訂本出版

巴金：寒夜　二十四元
巴金：第四病室　十八元
老舍：惶惑　三十五元
老舍：偷生　四十元
老舍：微神集　十八元
徐志摩：志摩日記　十五元
錢鍾書：圍城　三十元
斯坦貝克　趙家璧譯：月亮下去了　十五元
林語堂等作：文人畫像　八元
冰心等作：可紀念的朋友　八元
王家棫編譯：不能忘懷的人物　七元
趙家璧譯：蝴蝶的故事　八元

所有各書均按新定價目，七月一日起加一千倍實售

外埠郵購及預約・請寄郵局匯票或銀行匯票・地址如上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二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